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办公大楼新姿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 论法律秩序
- 论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 关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的两个问题
- 从“时间递进”到“空间传动”
- 从张九龄“阿党”轶议开元间南北文化之碰撞

学术研究



4
1989

ACADEMIC RESEARCH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 迎接广东省社科联成立30周年

——广东省社科联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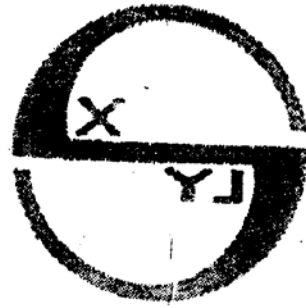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委常委杨应彬、省顾委副主任陈越平等
领导同志在广东省社科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广东改革开放理论研讨会
进行分组讨论活动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浩同志
出席纪念杜国庠诞辰100周年大会

封面摄影：黄寿恒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东 省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 外 代 号 : BN268

北 京 2820 信 箱

代 号 : 46-64 国 内 定 价 : 每 册 1.50 元

国 内 统 一 书 号 : CN44-1070

ISSN 1000-73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 穗 工 商 广 字 207 号

本 刊 每 逢 双 月 25 日 出 版

学术研究(双月刊)1989年第四期(总第九五期)目 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广东社会科学界学习、座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 (6)

政治法律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历史实践及发展

…………… 李长胜 陈一晖 (9)

论法律秩序…………… 傅再明 张文彪 (13)

经济

论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丘 杉 (18)

重构适应商品经济运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内涵…………… 陈 池 (23)

香港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 梁秩森 (25)

哲学

关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的两个问题…………… 劳承万 (28)

逻辑范畴系统的涵义、结构和功能…………… 王经伦 (33)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张系朗 (37)

科教

国外高教经费管理制度和我省高教经费管理体制的改革

…………… 杨移贻 黄循洛 (41)

深圳市经济系列职称改革的初步经验…………… 季纲岭 (46)

科学进步的社会环境特征…………… 吴素香 (49)

稿件主审编发 张硕城 责任编辑 黄荣显 封面设计 陈沛林

文 史

从“时间递进”到“空间传动”

——近代化历史的动力学思考……………乐 正 (52)

论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反应……………孙 谦 (58)

从张九龄“阿党”议开元间南北文化之碰撞

……………唐 森 林立平 (65)

论张九龄诗歌的主体形象与艺术风格……………陈新璋 (70)

在新的历史座标上选择：回归或超越

——也谈“岭南文派”……………文 能 (74)

书 评

读李种《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金华庆 (77)

企 业 之 窗

稳中求变，变中发展

——佛山市变压器厂的经营之道……………吴荣茂 (78)

书 海 酌 蠡

关于“守清”与“代清” (陈华新·80) “鲜规”释义 (黔容·57) 《楚辞》“余”

字别解 (张剑·22)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4, 1989)

CONTENTS

- To Stick to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and Combat with a Clearcut St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The social scientific circl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study and have an informal discussion on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6)
-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Multiparty CooperationLi Changsheng & Chen Yihui (9)
- On the Law Order.....Fu Zaiming & Zhang Wenbiao (13)
- On the Dynamics of Entrepreneurs Qiu Shan (18)
- To Reconstruct the Intension of the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Adapting to the Move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Chen Chi (23)
-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Tourist Trade and Its Causes..... Liang Zhisen (25)
- Two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Lao Chengwan (28)
- The Meaning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ogic Category System
.....Wang Jinglun (33)
- Question about the Theory of "the Basis and Superstructure of Unitary Economy"Zhang Xilang (37)

- The Management Systems for the Fund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Its Reform in Guangdong Province
..... Yang Yiyi & Huang Xunluo (41)
- The Preliminary Experiences in the Reform of the Titles of
Economic Post in Shengzhen City.....Ji Gangling (46)
- The Social Environmental Feature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 Wu Suxiang (49)
- "From Time Progression to Spatial Transmission"
—Pondering over the Dynamics of the Modernizational History
.....Le Zhen (52)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Western Culture during the
Opium War Period..... Sun Qian (58)
- A Curssary Discussion, Beginning at the "Clique" of Zhang Jiuling,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North Culture and the South Culture
during the Kaiyuan Period.....Tang Sen & Lin Liping (65)
- On the Stylistic Features and Art Forms of Zhang Jiu Ling's Poetry
..... Chen Xinzhang (70)
- A Choice Based on the New Historical Coordinate: Return or
Surpass—on the Ling Nan Schools of Literature.....Wen Neng (74)
- Book Review: "The Fundamentals of Current Western Economy" by
Li ChongJin Huaqing (77)
- Seeking Changeability from Steadiness and Making Progress in the
Changes—the Way of Management in the Transformer Plant of
Foshan City..... Wu Rongmao (78)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广东社会科学界学习、座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

广东省社科联于1989年7月13日在广州市举行了省社科联主席团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二十多位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在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的基础上，着重就如何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促进广东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座谈会由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张江明主持。省社科联主席团成员和部分专家、学者张绰、陈枫、林洪、王致远、梁钊、刘嵘、张元元、张磊、廖建祥、陈胜舜、詹伯慧、梁渭雄、邓演超等出席了会议。

与会同志认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对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对坚持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的意义。大家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决心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下，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为促进我省

两个文明建设和发展我省社会科学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与会者回顾了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过程及其在广东理论界的影响。大家认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繁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是每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

由学潮发展为动乱，直至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是重要的思想根源。国内外那些顽固坚持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少数人，为了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制造政治上的动乱，必然会不择手段地制造舆论，搞乱人们的思想，颠倒是非界限。而我们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极少数领导人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纵容、包庇、支持的错误态度，没有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坚决一贯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广东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但也并非风平浪静，安定团结的局面一度也曾受到冲击，因

此，我们既要看到，由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广东人民带来了实惠，省委、省政府比较注意思想作风和廉政建设，在防止动乱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我们思想理论界也比较团结，为稳定广东大局，维护广东两个文明的建设成果作出了一定贡献，总的比较好的，但是，也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广东的影响。在座谈中，与会同志还从思想理论的角度，分别列举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及其影响的各种表现，归纳起来，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突出表现之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人，竭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经“死亡”，否认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攻击马克思主义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是“独裁统治”的工具，否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污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僵死的学派，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否认马克思主义在指导社会主义实践中将会得到丰富发展。他们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鼓噪声中，又同时宣扬资产阶级学说，显然，是欲以资产阶级思想取而代之。由此，伴随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阐发、讲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受到冷漠，而宣扬资产阶级学说却很吃香。与会者认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就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批驳种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总结科学和实践成果

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突出表现之二。或者是鼓吹照搬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宣扬实行资本主义的“多党制”；或者是把出现在我们党政部门的腐败现象，夸大为整体、全局性的现象，散布对党和政府的失望情绪。其实质都是为了取消、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党的领导不同程度受到削弱和淡化，正是受此思想影响的结果。与会者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我们在理论上批驳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谬论的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反对并惩治“官倒”、腐败，按邓小平同志的要求，切实为人民办好几件实事，取信于民，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美化资本主义，丑化、反对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突出表现之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鼓吹“趋同论”，认为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已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殊途同归。宣传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是要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而中国近现代史证明，帝国主义并没有抛弃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属国、殖民地的迷梦。还有一些人，在经济领域鼓吹全面“私有化”。有人曾发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私有化”的主张，这种主张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经济制度，如果连经济基础都“私有化”了，那就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性质和特征，就意味着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鼓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自由，只讲民主不讲法治，只讲自由不讲纪律，搞极端民主化、极端自由化，闹无政府主义。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突出表现之四。鼓吹这种观点的人，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妄图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当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及其影响，还涉及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领域。例如，在哲学领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个学派，而不提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等等。在政治学领域，不讲工人阶级立场，不讲党性原则，完全不讲阶级斗争，对确实存在于一定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现象，也不运用阶级分析法，不问它姓“社”还是姓“资”，等等。在文化领域，主张“全盘西化”，宣扬所谓“性解放”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脱离我国国情，照搬西方现代派观点，提倡非理性化、非社会化，描写色情、暴力的作品充斥图书市场，等等。在历史学领域，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分析历史，否认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作用，美化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如此等等。

与会者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与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必须坚决

地批判和清除；一些受这种思潮影响而产生的错误的、糊涂的观点，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符合的，必须加以澄清。

今后怎样学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繁荣广东的社会科学事业，促进我省的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呢？与会者提出了如下几点意见：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研究，旗帜鲜明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在坚持、运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澄清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

第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和创新。

第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更积极、有计划地联系广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加强广东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和对策研究。

第五、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和加强我省社会科学的宣传、教学、研究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建设，更好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九八九·七·十四

（省社联学会处记录、整理、供稿）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 历史实践及发展

李长胜 陈一晖

一、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各国多党合作的历史形成、特征和演变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包括一党制和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目前世界上十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共有七个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合作制，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中国、朝鲜和越南。各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国情不同，各自的革命进程也不相一致，使得各国多党合作制的形成，确立各具特点。东欧四国比亚洲三国复杂，它们均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竞争观念强烈，革命胜利前后均有多个政党活跃在政坛，势力相当。而且二次大战后夺取政权又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苏联红军的帮助，未出现一党独家夺权的情况，所以，在建国初期只能以选举、竞争组成新政府。当然，各党派背后则是当时的苏联与英美联盟对欧洲控制权的争夺。如，保加利亚多党合作的新政府确立时的斗争就十分激烈。结果保共领导祖国阵线在政府选举中以88.18%得票优势获胜。此后的国民议会大选中，祖国阵线又以70%的选票获胜。大国民会议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分别由共产党人担任。此间斗争激烈，政局不定。直至1948年社会民主党与

工人党合并形成保加利亚工人党，壮大了力量，“环节”联盟和激进党接受祖国阵线纲领自行解散，其成员加入祖国阵线各组织，才最后形成了合并后的保加利亚工人党和清除反对派后的农民联盟的多党合作新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波兰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过程。我国、朝鲜和越南的情况则没有这么复杂。但无论东欧四国，还是亚洲三国，尽管各自的国情不同，但毕竟都处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转变时期。各国的多党合作制的产生和确立有许多相似的客观历史条件：第一，革命胜利前这些国家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多党合作、联盟的历史。波兰1942年初就成立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1944年7月又在此基础上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进行多党合作；保加利亚有“祖国阵线”；捷克斯洛伐克有“民族阵线政府”；民主德国在二战胜利后，很快就形成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等政党的友好合作；朝鲜有“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越南有“越南独立同盟”（后改为“越南民族联合阵线”）；我国共产党与各民主政党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先后经历了非直接配合到站到同一立场上，最后在“共同纲

领”基础上的长期合作。第二，这些多党合作大多是在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的大前提下形成的。法西斯的极端的反动性和侵略性，客观上共产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结成了共同的利益联盟，使它们之间具备了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我国则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独裁和消极抗战，丧失了人心，客观上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国民党内的左派推向共产党一边，与共产党合作。第三，各国工人党、共产党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使多党合作有了一个可靠的思想基础。各民主政党与共产党之间在统一战线思想下的真诚的互相承认、互相支持，则使多党合作制的形成有了现实的可能。第四，这些国家的革命性质、阶段和任务，基本上均是处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即使革命胜利后，由于这些国家均处于较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的任务仍主要是民主改革与发展民族经济，仍面临帝国主义的外来的政治、经济的压力。因此，存在进一步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些，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已有系统的论述，至今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芒。

多党合作制的一个根本的基础，是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以共产党、工人党这样的革命联合的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核心，多党合作制便失去了根本的政治基础。各国的多党合作制，几乎都有这个共同点，即民主政党一般都承认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拥护它的政治纲领和路线。

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又具有各自的特点：第一，各国民主政党有些有自己的纲领，有些则没有。第二，一些国家的民主

政党人数庞大，有明显的阶级利益，而一些民主政党力量较小，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阶级利益要求，只代表某个社会阶层。第三，到了80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情况又有新的变化，如波兰等。而在60—70年代，由于我国“文革”和“左”倾路线的干扰，多党合作制一度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得到了巩固、完善和发展。这些，是各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各自经历的不同特点。

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型政党体制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合作制，既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而是新型政党体制。其具体体现是：第一，从领导方式上看，资本主义多党制是一种竞争式的轮流执政体制，联合政府内各政党势均力敌，谁也不承认谁是领导党，谁又不得不承认都是执政党，共同领导，联合或轮流执政。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则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共产党与民主政党之间是领导党与被领导党的关系，同时又是合作的伙伴与朋友，即在民主政党承认接受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尊重、信赖各民主政党的大前提下的合作共事，共同参政、议政。第二，从党派关系上看是一种新型党派关系。既不象一党制，只有一个党而不存在党派关系；又与资本主义多党制内各政党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相互对立的关系不同。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内各政党是在共同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上的友好党和合作党，大家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保加利亚称这种关系为“兄弟般联盟”，波兰看作是“伙伴

式合作”，民主德国形容为“同志式合作”，我党则总结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党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从其形成到今天发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实行这一政党体制国家可分为两种发展情况：一是东欧四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民主政党既是执政党，又是参政党。民主政党不仅有议政、建议、监督权力，更重要的是参与执政。民主政党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委员会的副职和部长职务中占有席位。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常设局书记、波兰两个民主政党的代表分别担任本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德国四个民主政党各有代表担任副总理兼部长；波兰政府中有民主政党一个代表担任副总理，26个部长中有民主政党三个席位；在省、市、乡级政府中也占有一定比例，捷克斯洛伐克四个民主政党也各有代表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政府中担任要职。东欧国家的各民主政党与共产党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共同对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及其重大问题协商，决策，在政府中合作，共同行使国家权力。波兰1980年在原有三党“协商委员会”基础上，建立起三党“联合行动委员会”由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主要领导人组成。在颁布一项重大决策和作出重大人事变动之前，需要在该委员会内进行协商，必要时召开统一工人党与某一民主政党的联席会议共同做出决策，对国家命运负责。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大”确认：在保证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前提下三党结盟，并在世俗宗教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参与下共同行使国家政权。二是亚洲三国共产党（劳动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些国家的民主政

党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固定组织形式象“统战组织”（在各国名称不同）和非固定的协商渠道等，对国家大政方针及重大问题协商、交换意见，做到决策前咨询，决策中建议，执行中监督。这种方式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所形成的。例如在我国“人大”中民主政党领导人或党员作为代表参加，并且担任副委员长等职，充分明确民主政党在“人大”中的一定席位。在各级政府中，各民主政党领袖亦占一定的比例。

社会主义的多党合作制做为一种新型政党体制，尽管它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做法不同，但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在保证党政体制一体化的前提下，有利于团结更广泛的政治力量参政议政，扩大了民主，既保证了先进政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又增强了决策的民主化；同时，也避免了资本主义多党制下政党之间的争执不休、互不相让的局面。

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的关键在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之所以会形成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其它民主政党参与合作的多党合作制，而没有形成以其它某一民主政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制，是因为：一，共产党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它的纲领、路线符合民族、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长期的革命中取得了多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并具备了统治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实力。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东欧四国都是几个工人阶级政党合并成为一个党，力量尤其强大，成了国内第一大党；亚洲的中国、朝鲜和越南无论革命胜利前，还是胜利后，民主政

党影响都较小，而共产党（劳动党）一直是革命斗争的最直接的、主要的领导力量。三，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性、动摇性和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无法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也无法独立地担负起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国的情况是如此，而东欧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四，各民主政党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认识到，只有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由此，我们认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的根本一条，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共产党的政治核心地位。

必须指出，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领导核心，最根本的一条是它自身的先进性所决定。因此，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关键在于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不断保持其先进性，才能巩固自己在多党合作中的核心地位，才能不断得到各民主政党的信赖和拥护，才能使民族和国家不断地发展、兴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保持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是最

重要的，也是维系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一定要同各民主党肝胆相照，同舟共济，要发扬民主作风。切不可大党自居而排斥别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和衷共济、团结一心的多党合作的良好局面。共产党应自觉接受民主党的监督和批评，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失误，清除内部的腐败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他人，取信于大众。共产党在加强和发展自身的力量的同时，要积极支持、帮助其它民主政党发展自己的组织和力量。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多党合作制要在法制的轨道上巩固、发展。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合作党，都应在法律规范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利、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多党合作制不断巩固和发展

作者单位：广西师大政治系

广东省社联

责任编辑：余力



论法律秩序

傅再明 张文彪

所谓法律秩序,是“由法律确立和保护的人与人相互之间有条不紊的状态。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就是违法行为”(《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这个定义在我国国家具有代表性。这个定义存在这样两个问题:其一,“由法律确立和保护的人与人相互之间有条不紊的状态”究竟指实际上由于法律确立和保护而形成的状态,抑或指符合法律规定的实际状态。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的含义比前者广,因为后者不仅包括法律实际起作用造成的状态,还包括符合法律规定但并非法律作用所造成的状态。其二,该定义没有说明“状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指行为抑或指关系。苏联法学家Л·С·雅维茨认为“法律秩序是社会关系的这样一种状态,它是法律规范和法制实现的结果,保证社会所有成员无阻碍地享受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也履行他们的法律义务。”法律秩序“存在于法律地位和权限、权利和义务的实现过程所形成的关系中,它包括稳固的法律联系和关系的体系。”^①雅维茨明确了法律秩序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状态,但他把这种

社会关系的状态归结为法律规范和法制实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仅仅法律就能使社会关系处于秩序状态吗?

我们认为,法律的出现,满足了存在商品经济和阶级冲突的社会所需要的明确、稳定及权威的秩序方式。但法律从未取代其他社会秩序方式。在现代社会,维持秩序的方式很多,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是社会对其成员的行为所做的相应的正式行为,它涉及有组织的专门机关系统和标准技术。正式的秩序方式包括两个主要类型:一是非国家的正式团体所设定的,如商业组织、宗教团体、俱乐部、学校等等所制定的规则;二是由国家设定的正式秩序方式,主要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非正式”的秩序方式指并非官方或正式团体设定的,亦无专门机构执行的社会控制手段,如习俗、道德、信念等等,它们通过人与人的互动来传播,并通过谴责、批评、赞扬、情绪表达、赞成或反对的目光等等来执行。非正式的秩序方式在社会秩序中起重要作用,即使是正式秩序方式通常也受到某些信念、习俗、态度、舆论的支持或反对。因此,除法律外,还有其他社会秩序方式,它们各有其

功能，在维护社会秩序中互补互赖，从而保证相对稳态的社会秩序。

至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法律秩序就是法律与其他社会因素（社会控制手段）互动所产生的社会主体间与法律直接有关的社会关系体系。

具体的社会形态的法律秩序要受制于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就必然反映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秩序中，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双重调整机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现象。所谓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双重调整机制，指的是共产党制定的政策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事实上对社会关系直接起调整作用，这样就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存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双重调整，我们党制定的政策既有长远的、宏观意义上的政策，也有为解决近期具体问题的、微观意义上的政策。有的政策是通过上升为法律来实现的，有的政策则并不通过上升为国家意志而直接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即使是前者，政策仍会单独起作用。虽然不存在专门执政党的政策的强制性机关，但由于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具有巨大的政治权威和号召力，有各级党的组织和几千万党员的贯彻实施，加上社会主义法制尚不完备，所以有可能越过国家，而直接通过政策实现对社会的领导。或者把国家机关作为执行政策的机关，党政不分，党的政策取代法律。我们国家从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是如此实践的，并且还形成了一套党政不分的体制。

法律秩序中的双重调整机制会导致无序现象。这是因为政策的规范性不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以政策引导具体的社会关系，往往不如法律规范稳定和严格。另外，在双重调整机制下，法律的调整作用必然会受影响，尤其是当两种调整方式发生矛盾时。有一次调查表明当中央的政策与法律发生矛盾时，虽然25.2%的司法人员认为应当执行法律，24.8%的司法人员认为应当执行政策，但实际执行中，依政策办事的却占65.5%，执行法律的占34.5%。

从双重调整体制逐步过渡到单一调整体制，也就是过渡到以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最高的权威调整方式，其他社会调整方式在效力上低于法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完备，双重调整机制将会改变。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秩序在以下几个变量上，还处于相当低的层次上，也就是说，人们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意识还有待提高，许多人不知道或不习惯于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对应尽的义务还缺乏法律上的责任感。这不能不影响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民主性。国家机关的活动有待法制化，这包括行政管理活动、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需要纳入法制的轨道。在人民的权利义务意识较低的情况下，法律秩序就会更多地表现为人民群众为避免触犯法律而消极地对待法律，人们更多地关心法律禁止什么，而不是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是什么；

不关心自己的权利，同样就很难尊重他人的权利；因而对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缺乏主动性。在国家机关的活动缺乏法制的情况下，秩序就会更多地为“长官意志”所支配。当缺乏法律引导和约束的个人任性成为国家机关活动的决定因素时，这本身既是缺乏法制的表现，同时又是造成法律秩序的无序的重要原因。

(三) 通过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来肯定改革的成果，也就是将改革中出现的较成熟的稳定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秩序，以及直接通过法律秩序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体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秩序的突出特点。也正因为这一特点，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秩序在局部上相对多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另外，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现代化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不经过一段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等方面都进行深刻变革的时期。破坏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同步进行，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秩序既有稳定性连续性的一面，又有变化较快的一面。诚然，任何法律秩序都是稳定和变化的统一，但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随改革和建设不断调整社会结构和关系，因而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秩序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对已颁布的法律进行修改或补充，都是必要的。但变化频仍，难免会对法律秩序的

稳定性造成不利的影晌。因此，保持法律秩序稳定性和变化的协调，使变化在不危及法律秩序稳定性的情况下进行，而稳定性又不妨碍新秩序的建立、旧秩序的瓦解，意义颇巨。

(四)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在人的心理上的积淀，会强烈地影响着法律秩序。这主要指传统的道德、习惯、观念等等对法律秩序形成所产生的正的或负的影响。所谓“正的”影响，指某些传统道德、习惯或观念是造成法律秩序有序性的因素之一；所谓“负的”影响，指某些传统道德、习惯或观念是造成法律秩序无序性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积淀如何导致人们做出符合法律规范（主要是禁止性规范）的行为，也可以看到人们在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下做出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因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得益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从而得以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另一方面，我们的法律秩序又常常受到传统文化中的反法律文化的威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秩序的又一突出特点。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秩序就是处于较低层次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通过法律与其他秩序方式的互动的实现过程。该过程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秩序形成的机制与条件。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秩序形成的法律机制

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无论法律的主要功能或次要功能的实现都主要依靠人

们遵守或服从。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提供足够数量的官吏去强迫每个人遵守法律。从这个角度出发，初级阶段法律秩序形成的法律机制有赖于法律要能够为绝大多数人自愿遵守或服从。而要做到这一点，法律本身要具备如下条件。

首先，法律规范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起导向作用。而要起导向作用，（1）法律规范应当为人们提供行为模式。作为社会性的，而不是个别人的行为模式，它必须具有价值判断的性质和可预测性。所谓“价值判断”，就是说，法律规范体现普遍的价值信念，可以成为有法律意义的社会行为的判断标准，而且这种价值判断是可以与其他社会价值判断互相代换的。比如违反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行为，通常又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违法行为在法律上得到否定的评价，同样在道德上也得到否定的评价。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存在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当社会主义法律与非法律的社会规范的价值一致时，法律的导向作用就会增强；反之，法律的导向作用就会降低。所谓“可预测性”，就是说人们可以借助法律规范预先估计到在某种条件下他人将会如何行为，也可以估计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规范作为价值尺度可以帮助人们判断行为的性质，选择法律肯定的行为。（2）法律规范要起导向作用，还要有适当的制裁。制裁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前者为奖励，后者为惩罚。惩罚是法律规范导向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我们往往容易强调惩罚的作用，殊不知，奖励也是非常重要的导向手段。通过奖励性的积极制裁鼓励公民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同违

法现象作斗争。

其次，法律规范必须是可行的，这包含几层含义：（1）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办到的，法律要反映社会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可能性，任何法律都会受到客观可能性，包括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挑战；（2）法律规范应有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性，这一方面靠立法技术，另一方面靠实施法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把书本上的条文变成适合社会发展的现实关系；（3）法律规范应是内在统一的、不矛盾的体系。

再次，通过执法，使法律规范内在的强制性转化为外在的强制活动。为了正确实施法律，一方面法律角色如法官、检察官、警察等等具有与其承担的角色相适应的水平；另一方面要有适当的程序规定并严格遵守程序。当然，在这两方面，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远不够理想，相当多的司法、执法人员与其担负角色所要求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秩序形成的非法律机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秩序形成的非法律机制可分为规范性机制和组织性机制。规范性机制又可分为：第一类是普通的、在全社会通行的非法律规范，如中央的政策（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全社会通行的道德、习惯等等；第二类是亚群体的规范，也就是构成社会的团体和社区的规范，如宗教性规范、亚群体通行的道德、习惯、亚群体的规章制度等等。组织性机制指的是在法律秩序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团体，如政党、工会、行业组织、学术团体等等。

我们知道，法律只能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主要部分做抽象的规定，从而为社会生活奠定基本的构架，在此构架中还需要相应的许许多多的小构架和具体模式。无数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直接有关的非法律社会规范就起到这种作用，而其中，制定的规范又占了重要地位。当然，我们还不能说，现实生活中所有团体制定的规范都与现行法律秩序并行不悖。比如非正式团体中的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团体，它们可能也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但这种规范显然与现行法律秩序格格不入。

任何社会的法律秩序都有赖于非法律的一般社会规范的支持，这就要求法律规范与一般社会规范大体上整合或协调。而法律规范与一般社会规范的整合是双向的协调过程。一方面，法律规范作为社会规范中处于最高层次、具有最高效力的规范，当然要深深地影响着一般社会规范的形成与存在，并竭力排除与法律相佐的情况；另一方面，一般的社会规范也影响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有的甚至上升为法律。在人民群众中具有生命力的一般社会规范，往往本身就是社会生活条件的客观反映，构成“国情”的一部分。如果制定和实施法律不考虑这一点，法律就难于实

现。正是这样一种双向的协调过程，保持了法律与一般社会规范的整合。应当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许多传统的积淀形成改革的强大阻力，所以社会主义法律所负的整合社会规范及价值的责任特别重大，特别要注意发挥法律在树立新道德、习惯、观念和消除落后的道德、习惯、观念方面的能动作用。

由此可见，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富有生机的规范因素，一般社会规范对法律秩序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秩序是个大课题，远非上面论述所能及。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对它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无论是发展我们的理论，深化我们对法律现象的认识，还是促进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

① 见《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苏）雅维茨著，朱景文译，孙国华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广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
责任编辑：郑英隆

论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丘 杉

在我国改革不断深入，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不同利益阶层（集团）正逐步形成的情况下，有一个问题十分值得研究，那就是社会动力层问题。究竟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层呢？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有许多流派涉及社会动力层问题。其中最具有影响的，便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在熊彼特的理论架构中，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分配，也不是均衡，而是经济结构的转变。从这出发，演变出他对“创新”的特别重视。他坚持“创新”——企业家利用资源，以新的方式来满足市场需要——是经济成长的原动力。他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把企业家定义为“革新者”，他指出，企业家的特点和职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的没有试过的技术可能性，通过开辟原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通过重组产业等等来改革生产模式或使它革命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文本，第164页）“这种职能主要不在于发明某些东西或创制出企业得以开发利用的某些条件，而

在于把事情付诸实行”。（同上，第165页）他认为经理不能都有资格称为企业家，只有他对经济环境作出创造性的或创新的反映，才能够被称为企业家。他指出，一旦企业家证明某种新方法有利可图，其余的人会群起效法。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企业家的利润会随时受到新生产方式、新创新的影响而消失，产生“创造的自灭”，因此，企业家为了取得自己的利润，就需要不断的力争上游，这种力争上游的压力正是促使经济长期成长的动因。在熊彼特看来，人类经济福祉的提高，是由于企业家创新行为及冒险投资。

对于熊彼特的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借鉴呢？长期以来我们理论界持否定态度。否定的理由有二：一是认为它完全抹煞了生产关系及其变革，撇开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撇开了阶级斗争来谈历史进步，因此是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二是认为熊彼特把创新者规定为将“创新”引入经济活动的企业家，这样一来，资本家就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了，这是赞美剥削。这二种否定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亦有其商讨余地。熊彼特确实是只从创新的角度谈

社会进步，他没有直接论述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如何变革的问题，但是他提出的五种创新形式（新产品的引进、新生产方式的采用、新市场的开辟、新的原料来源或半制品来源的取得、新的产业组织的推行）实质上是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进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不能说是唯心的。另外，熊彼特并没有将企业家等同于资本家。正如他区别了经理和企业家并非等同一样，他也指出了企业家和资本家在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上是不同的，企业家是指“新组合”的具体推行人，当然为了推行“新组合”，他必须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可供其支配使用，但这种支配使用权，既有自己对必要的生产资料所有为基础，也可通过资本家的信贷来获得。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股份公司出现，资本的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也是分离的，到今天企业家往往不是资本家。确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家具有剥削的一面，但如果抛弃这个特点，仅从他们的功能上说，企业家的精神并不为资本家作为阶级的存在或消灭而否定。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接受其合理部分，进而重视企业家阶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

在过去经济建设中，我们一个重大失误，便是没有重视企业家的作用。建国后到1979年底的二十多年间，由于我们实行了单一的指令性管理模式，党政合一，政企合一，因此，相应地，管理和经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基本没有独立作出对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权利。他们往往只是国家计划的

执行者，能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就算完成任务，缺乏“创新”的冲动和条件。由于企业经营者不能执行“创新”职能，“创新”的使命实际上由计划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承担，由他们通过制定各种指令性计划来对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但是，由于他们在制定指令计划时候往往忽视了市场需求，排斥了竞争，脱离了利润导向，因此常常造成供需不平衡、投资失控和生产资源的大量浪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状况开始转变。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各项措施的逐步展开，以下放经营权为主的各项企业改革措施诸如承包、租赁以及厂长负责制等，使国有企业（国营和集体）开始摆脱行政附属物的地位，开始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转变，向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法人方向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原有企业的厂长经理逐步有了“创新”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冲动，他们开始具备企业家的特质。他们根据市场变化开拓新产品、新市场；在企业内部实行新的管理形式，使用各种方式提高工人积极性；加强企业挖潜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总之，随着企业家创新活动的不断加强，企业活力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也大大加快了。

三中全会前后的变化告诉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有没有“创新”的企业家阶层的存在，关系到发展的快慢，有则快，无则慢。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家的动力作用，以培植强大的企业家阶层作为深化改革的任务之一。

目前，由于旧的经济体制仍然在起作用

用，新的经济体制没有完全确立，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仍受到种种限制，其动力作用仍未充分发挥出来。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抓如下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创造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

首先要提高企业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农本商末”、“重义轻利”和“官本位”的传统思想，造成了对利润的蔑视和对从事财富创造者的社会地位的贬低。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在社会上企业领导人的地位不高，从事实业也不是优秀人才的最佳选择。这种状况必须扭转，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形式，如宣传企业家的作用，宣传成功企业家的事迹，在政治生活中突出企业家形象等，来提高企业家的知名度，让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我们社会中需要悉心培植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以激励现有企业家的奋进，并吸引大批志士投身实业，大显身手。

其次要改造我们目前国民性中过分保守依赖的一面，加重进取心的比重。我们要在尊重社会和别人利益的同时强调个人利益的合理性，提倡独立自主，敢于冒险，勇于负责的进取性格。另外，要树立在经济活动中盈利、等价交易、风险报酬等的正当性和不可侵犯性。只有在这种进取的国民性格的基础上，才能培植起企业家精神。

第二，进一步拓宽企业家产生的渠道

首先是从强化企业独立性着手，锻造公营企业家。公营企业家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家阶层的主体力量。我们上面分析过他们从不具备企业家特性到“准企业家”的过程，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企业越独

立于行政，企业家越具有完备形态。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在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的基础上，将企业的决策权从企业之外完全转到企业之内。目前的承包制在保证企业独立上比以前所有形式都大进一步，但仍有缺陷，由于企业产权不清，它未能最终使企业摆脱行政干预。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稳定后，承包制必须进一步向新的形式过渡，股份制是其中的一种。同时，公有企业领导人的产生，要进一步脱离行政任命轨道。在目前承包制下，可以推行竞争承包或民主选举厂长等办法，在股份制下，由企业董事会进行估评考核、招聘或解聘。

其次，解除政策疑虑，加快私营企业家的发育。私营企业家是我国企业家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对私营经济的政策宣传不够，使许多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人疑虑重重，不愿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多从事投资回收期短的商业服务业，少投资于回收期长的工农业。今后我们要加强宣传我们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稳定性，确认私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公有经济的重要补充，只要守法经营，勤劳致富，国家就应保护。让他们解除疑虑，向更高层次发展，使有更多的私营企业家补充到企业家队伍中来。

再次，要保障利润动机，吸引外来企业家。在开放的经济结构下，外来资金和外来企业的涌入，是推动发展的力量。外来企业家是我国企业家阶层中不可忽视的有机部分。他们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对我国企业家起示范作用，他们同时带来产品和市场的竞争，又促使我国企业家成熟。目前我们正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而改善投资环境的中心，是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取得比他们在别处能取得的更高利润。保护和满足他们的利润动机，外来企业家便会越来越多。

第三，完善企业家的奖励机制

因“创新”而获得较高的报酬，是对企业家才能的报偿。企业家收益越高，其冒险犯难的决心便越大。目前我国企业家的奖励机制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平均主义”影响下的企业家收入偏低。国有企业规定厂长经理完成任务后可以拿工人奖金的一到三倍，在实际中厂长们能拿足的很少，在各种平均主义因素影响下企业家的收入只是工人收入的一倍左右，有的比按件计工的工人还低。二是管理大企业的企业家的收入和管理小企业的收入倒挂。一般现象是私营企业家高于乡镇和集体的企业家，后者又高于国有企业家。责任和报酬不对等，使许多大企业的企业家产生强烈的不平感。三是承包制没有把创新获得的利润与社会环境的发展带来的价值增长分开。平庸的企业家也可占有社会发展的果实，取得高报酬。

要创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必须打破平均主义思想，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给予企业家以更高的报酬，尤其是对那些国有企业家。目前的“倍于工人收入法”不如“利润分成法”科学和明确，因为利润体现企业家才干，按利润分成可以促使创新者才能得到承认。在目前承包制下推行利润分成法，首先要将承包基数和平均利润挂钩，达到平均利润只取一般报酬，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按一定比例奖励企业家；在实行股份制后，利润分成法必须和股息增殖率相联系，按一定数量的股票增殖额给予企

业家奖励。可以奖给现金，也可以奖给一定股权，以使其有长远考虑，避免短期行为。

第四，规范企业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市场是企业家活动的舞台，竞争是企业家前进的动力。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以强汰弱，以成功论英雄。

目前我国市场有两大缺陷阻碍了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一是市场发育不完备。表现在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和金融市场开放度不够。如金融市场是国家独占的，没有企业性银行，没有证券交易。在这种垄断和狭窄的市场上，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素很困难，融资渠道单一，使企业不能迅速大量集资，因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创新组合。二是市场秩序不规范。现在价格、利息和税率在各企业间区别对待，使企业生产要素的取得有难有易，有贱有贵，负担有轻有重。这种不规范造成了企业家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使得利润不完全体现企业家的才干。有许多企业家通过独占、人事关系、仿冒、偷税漏税等方法取得利润，而不是诚实的竞争。

要使市场发育和规范，我们要不断开放生产要素市场，深化改革。如金融市场，就必须进一步改革体制，使银行专业化、企业化，配合企业股份化的改革，通过有关证券、证券持有人权利以及企业组织等法律，发育金融市场。要完善各种经济法律，尤其是税法、合同法、破产法和兼并法要进一步拟定和实施。只有建立了公平竞争的机制，才能以强汰弱，不断淘汰那些懒惰保守的企业家，促进“创新”的丛生。

概而言之，只要我们创造出企业家产

生的土壤，又有引起创新冲动的激励，我们就可以预期企业家将迅速崛起而成为一种强大力量，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社科院经济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楚辞》“余”字别解

张 剑

“余”在古汉语中一般用作第一人称代词。但《楚辞》中的“余”，又作连词“而”解，这却为人所忽略，不可不辨。兹举《离骚》中的几例：

- ① 饨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 ② 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 ③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 ④ 驷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

例①中“余”连接“饨”、“郁邑”和“侘傺”，这三个形容词并列，都是形容下句“吾”悲伤的样子。若将“余”解为“我”，则三个形容词断隔不连，语意不畅，且与下句之“吾”重复，而解为连词“而”则甚顺。同样，例②例③例④中的“余”均应作“而”解。

“余”为什么可作“而”解，有无训诂根据呢？有。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云：“‘余’犹‘而’也。‘余’训‘而’，犹‘与’训‘而’，亦犹‘于’训‘而’也。‘余’、‘与’、‘于’古皆同音。”另外，我们还可拿《离骚》“溘埃风余上征”（王逸注：“溘，掩也。”）与《远游》“掩浮云而上征”参互比较；也可拿《离骚》“饨郁邑余侘傺兮”、《惜诵》“心郁邑余侘傺兮”同《哀郢》“心婵媛而伤怀兮”参互比较。这两组句子，前一组句意相同，后一组句意相似，其中“余”、“而”乃互文见义，足证“余”可训“而”。如果忽视《楚辞》中“余”的这种特殊用法，把它都解为第一人称代词，那是不确切的。

“书海酌量”责任编辑 刘斯翰

重构适应商品经济运行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内涵

陈 池

城市改革伊始，大家往往认为：改革仅仅是“管理方法”的问题；稍后，又把目光集中在“放权”、“分权”上，以为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之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然而，近几年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企业非理性“趋短”行为，社会经济效益递减，现存的大一统的公有制权力总使商品经济及其体制按其既得利益方向转化等等，清晰地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商品经济的成长，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变得越来越突出。新的所有制的规定性如何？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1. “一企多制”（所有制）协作兼容。

如果说，我国从过去只存在单纯的公有制形式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一个企业内部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互相渗透，则是所有制改革认识与实践的深化。

商品经济使社会协作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生产力的协作，而且包括生产关系的渗透与协作，包括不同所有制的协作。因此一个经济实体内部可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兼容。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协作，正如生产力的协作一样，不但是必然的，而且能够互补制约，凝聚更强的“所有制力量”。

2. 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独立性、分散性

与联合性的统一。

实行了“全民所有、企业经营”的二权分开，使经营权分散与独立是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二权分开，确实能在短期内搞活企业，不过令人担心的是，不少企业已经出现了不合理的经济行为——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是企业自己的而进行掠夺性的“趋短”经营。因而，单单是经营权的独立与分散是不足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本身也要改革，也要实行独立与分散。商品经济使各利益主体的相对独立性不断加强，这种独立性体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上，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独立性的发展（不仅仅是经营权的相对独立），如果仅仅止步于企业经营权的独立性，其作用是有限的、表面的。

从另一角度审视，新科技革命神速的演进，使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的同步化、集中化、大型化的特点不断淡化，代之而来的是小型化和分散化，生产资料所有权必然要与此相适应。

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还碰到一个障碍——全民企业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自负盈亏。既然如此，企业谈不上作为独立的经济活动实体而进行竞争，使市场机制的运行轨道扭曲。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过分集中化，因

为虽然企业的经营权分散和独立了，但由于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统一于国家所有，企业亏了，国家必然来一点“父爱主义”，给予企业一些优惠照顾，这种条件下，预算约束的软化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一旦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于国家或者部门和地方政府，这些所有者总要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经营者真正独立性就难以发挥。

由此观之，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化，使企业走进了困境。只有使所有权分散与独立，才能割离企业依赖国家和地方的“脐带”，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活动主体，以适应于商品经济的运行。

经济发展的现实不但证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散的必要性，还向人们提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联合化的优势。

联合化不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高度统一的集中化，它是在尊重各利益主体分散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社会化协作的不断加强，单独地、分散地占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力量显得不足。那么是否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复归为高度的集中？这种老办法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唯一的出路是发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联合来适应。联合起来的所有权，才能构成它们之间功能的互补与制约关系。企业集团的崛起，显示了这种联合效应的信息。

3. 商品经济发展中的新型所有制，还要体现“共同联合”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特点，重建个人所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天才地预见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点。他指出：“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2页）在这一逻辑推论中，由前两项的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共同占有与协作基础上的新型个人所有制是一个历史趋势。

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有两个特点：①生产资料要体现个人所有权；②在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基础上共同联合起来。这些思想似乎可在当代股份制实践中找到现实依据。人人入股，人人对企业的生产资料都有一部分直接的所有权，这种个人所有制又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联合起来的，体现了“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性质，当然，股份制仅仅是一种形式，还存在不少局限性。

作者单位：湛江雷州师专

责任编辑：郑英隆

香港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

梁秩森

香港的旅游业，与制造业、金融业、外贸、房地产等一起被誉为香港经济的支柱，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

50年代，香港旅游业收入还不占重要地位，这时对外的服务收入主要从海外驻港军人、过境军人在香港的开支中取得。1958年，到港游客人数仅为43453人。6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非军人游客费用开支迅速增加。进入70年代，香港的旅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73年，吸收游客已达179万人，收入为13.32亿港元，占香港生产总值的7%。此后，自1981年到1988年，香港以年平均增长11.7%的速度吸收游客，旅游收益年平均增长为22.7%，旅游收益占香港生产总值6—8%上下。1988年，香港吸收游客总数达550万，旅游收益达340亿港元，旅游收益占香港生产总值4256亿港元的8%。长期以来，香港旅游收益一直是香港达至外贸平衡的重要因素。1981年至1984年，香港旅游收益分别弥补了有形贸易逆差的60.4%、56.6%、77%及全部。据有关当局统计，香港1984年在游客人数和收益方面均已占亚太地区的第二位，仅次于夏威夷。

香港的旅游业，不仅以其直接收益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而且通过推动各业发展从而对香港经济起着重大的作用。

首先，它直接促进了交通运输，特别是航运业的发展。据统计，从海外抵港的游客80—90%是乘飞机来的，1987年游客来港使用的工具中，乘飞机来的达373万多人次，占游客总数的83%，自1951—1981年的30年中，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抵港、离港飞机架次不断增加，1981年比1951年增加近10倍，达55393架次。1987年、1988

年更分别达73643架次、87000架次。远洋轮船抵港也由1950年的6776艘1165.9万吨增加到1987年的15241艘8685万吨，分别增加了124.9%和6.4倍。适应旅游的需要，香港的公共汽车、出租小车、电车、渡海轮船、山顶缆车、地铁也发展很快。1988年，香港已有地下铁路38.6公里，37个车站，平均每天接载乘客190万人次，以每公里路程计，已成为世界上载客量最大的地下运输工具之一。此外1988年香港持牌的车辆达316472辆，其中公共巴士6565辆，公共小型巴士4341辆，的士16805辆，私家车13943辆、电车163辆。多种公共交通工具平均每天运送乘客968.7万人。所有这些，都给交通运输部门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其次，有力地促进了房地产建筑业的大发展。为发展旅游，吸引外国游客，香港近年兴建了大量的旅馆、酒店，开辟旅游点、娱乐中心、营造博物馆、展览馆、会议大厦、修筑城乡道路、车站码头等，这就为房地产建筑业发展带来了活力。据统计，从1961年到1987年，建筑业投资每年递增16.39%，1987年约高达305.31亿港元，成为香港投资最大的行业之一。而土地拍卖1987年面积达17.9万平方公尺，价值达41亿多港元。此外，各种为旅游服务的设施的建设，也花了大量资本。

第三，带动了旅行社、旅馆业、饮食业、食品加工业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前，香港旅行社不足300家，现在大小旅行社已发展到约1000家。酒店1970年为53家，1987年为57家，但房间总数却从1970年的8567家增加到1987年的21022家。就业人数从1970年的11390人发展到1987年的25684人。

第四，促进了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由于香港是自由贸易港，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因而

各国货物云集，价格低廉，有“购物天堂”之称。来港游客的消费结构，购物比重一般都达50—60%。1987年游客消费总额为248.37亿港元，其中购物为128.57亿港元，占51.8%，饮食占11.4%，娱乐占1.7%；观光占2.8%，住宿费用及其他占33.5%。可见，购物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从而带动了香港产品的生产，推动商业和外贸的发展。

最后，香港的旅游业，还为扩大就业提供了条件。据香港旅游界人士估计，约每12位游客即可提供一个人一年的就业机会，40多位游客的消费可提供一个居民一年的就业收入。这样，一年就可提供几十万人的就业机会。事实上，目前香港直接、间接从事旅游业的职工约十万人，如果算上与旅游业有牵连的行业，带来的就业机会就更多了。1987年，就业人数271万人中，批发、零售、出入口业、酒楼酒店从业人员就达62.9万，占23.2%。

二、香港旅游业久盛不衰的原因

香港旅游业为何能发展得这样快？且经久不衰？从客观的因素或外部条件看，主要是它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发展旅游业的良好外部条件。这里既包括它背靠我国大陆，位于世界航道要冲的优越地理位置，别具一格的亚热带海岛风光，也包括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经济及经过几十年精心建设而成的港口、码头及现代化的运输、通讯设施，更包括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地位，以及一百多年来的对外商业联系尤其是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商品进出口，人员出入境的方便、商品便宜，等等。

但如果从主观努力来看，关键是香港旅游业有一套成功的经营策略和方式。

1. 下本钱创造吸引游客的物质条件。外国人到香港旅游，首先要住得好。因此，能否有良好的旅馆（香港一般称为酒店），以便得到舒适的享受，消除旅途疲劳，就成了能否吸引游客的先决条件。香港旅游业对此下了大本钱。酒店投资（不计地价）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15年间，达10亿港元以上。香港酒店不仅发展迅速，而且规模大、设备先进、管理现代化，高级酒店不仅设备齐全，还提供特殊服务，如电传、通讯、翻译、秘书等各类服务，现代化的酒店为旅游者带来了现代化的享受，因而酒店入住率高，从1977年开始都在80%以上，1987年为90%，

1988年更达92%。

2. 根据自身的特点，开辟别具一格的旅游资源。香港旅游业在建设旅游设施中，除了充分利用原来的海岛海滩、寺院、古迹等资源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较为成功地创造出了各种新颖、独树一帜的旅游项目。如深受游客欢迎的海洋公园，这里有香港最大的海洋水族馆，有使人惊叹不已的海洋剧场的海豚、海狮和鲸鱼表演，有蔚为壮观的架空缆车、世界最长的上山电梯等。再如富有中国特色的“宋城”，它模仿宋朝的建筑物而创立，城内房屋设计、街道布局、家具样式、人员服饰、风俗习惯都和宋朝相仿，置身其中，令人有回到历史之感。此外，近年来陆续兴建的太空馆、伊丽莎白体育馆、艺术馆等，也深受游客的欢迎。

3. 采取多种手法，开设各种旅游项目。一是积极争取世界各地各种集会、会议及展览会来港举行。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平均比其他游客消费能力高（如据资料显示，1987年平均一名普通游客在香港消费为5000多港元，而平均每名商务旅客在港消费在一万港元以上，后者为前者的2—3倍），停留时间长，回国后还能起积极宣传作用，有关方面往往不遗余力，而且取得成功。1976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会议和展览仅为15次，1988年已发展为480次。1987年，香港被列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际会议目的地。二是举办奖励旅游活动。据统计，每年约有五万名游客参加此项活动，此项活动主要由旅游协会主办，邀请各地旅游专家参加，旅游协会为他们提供各项奖励性旅游资料、设备及交流机会，借以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如1984年旅游协会就举办了一个以“迎合特别兴趣的观赏路线”为题的国际研究会，邀请了24家海外旅游公司参加。1985年初，又举办了一次名为“国际精打细算购物比赛”，比赛的内容是由到香港的旅游者用一万港元购买指定的10件商品，以质优价廉为获奖标准。这次活动十分成功，有6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报纸、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评奖大会，广泛报道了这项活动，使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不胫而走。三是组织特种兴趣旅游，如利用具有现代化水平、规模巨大的太空馆、体育馆的建筑和设备，吸引世界性体育活动来港举办。利用香港优越条件，如烹饪、针灸、武术、传统节目、宗教活动等吸引部分游客兴趣。1988年8、9月间，旅游协会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香港食品节”，在香港仔一

艘海鲜舫上举办的“海上美食城”，平均每天便有1500人前往参观试食。四是积极开办各种娱乐活动。如中秋节彩灯会、元宵花灯节、端午节国际龙舟竞渡等项目，吸引游客来港。这些节目盛况，由电视台转播、本地及国际新闻界争相报道，既增加了旅游收益，又扩大了影响。

4. 注意培训旅游专业人员，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劳务服务，游客到港的衣、食、住、行、游览、观光、社交、娱乐等活动，乃至健康、安全等，都要有人为其服务、精心组织安排，因此，服务质量和水平，就成为旅游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香港培训旅游专业人员采取多种途径，港府工业训练局下属的商业训练委员会负有培训酒店、旅游各种专业人才的任务。香港大学、中文大学以及5家工业学院和其他学校，都开设有旅游训练课程，不仅导游，而且经理、服务员、话务员、柜台人员都分别进行专业培训，量才录用。香港旅游协会一向注意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礼貌教育，使之做到周到、快捷、准确、高效，酒店旅馆为满足各种不同要求，还为游客提供各种特殊服务，如快速洗衣、代修贵重物品、擦皮鞋、预订机票、车票、保姆照顾儿童、代运行李、代发邮件、代租汽车、医生夜诊、长途电话服务，提供秘书、打字员、私人厨师、保卫人员、侍者、专人陪伴游览、代购物品、租用打字机或健身器材等各项服务，1978年以来，还在旅游业中推行礼貌运动，对讲礼貌、服务态度好的人员，不仅给予奖金、奖品，还给予免费外出旅游或提升晋级。1984年开始，还创造了一个“礼貌热线电话服务”，游客可随时拨电话提名嘉奖在香港为他们热心服务或提供方便的人员，这就使服务质量更上一层楼。

5. 加强市场调查、重视宣传推广。香港旅游业经营的重点在于吸引更多的高收益游客来港。为了掌握市场情况，摸索发展规律，于1957年6

月成立了由港府直接控制的香港旅游协会，早在1966年便设有旅客调查，通过调查，经常为旅游业提供资料，调查的内容包括：游客人数、来源、性别、年龄、身份和收入，在港逗留时间、淡季和旺季，在港的活动和消费方式、喜厌、对旅游设施的意见等。通过调查、分析，掌握高收益阶层情况，进而明确市场的开发重点、制订计划，确定经营方针和政策。在对外宣传方面，旅游协会更是不遗余力。它主要透过驻在东京、大阪、芝加哥、纽约、三藩市、洛杉矶、悉尼、惠灵顿、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和罗马等13个海外办事处宣传香港，吸引外国人来港游览，与航空公司、旅行团经营商及酒店在海外协力推广宣传。其方式主要是利用电影、电视、报刊、杂志、摄影、新闻图片资料等宣传媒介，介绍香港的历史、文物、名胜、风景，出入境手续。例如印刷精美广告以8种文字在十多个国家的传播媒介上刊登，每年印发数以百万计的各种旅游手册及宣传品。除确定美国、日本、澳洲及东南亚的消费者为重点外，还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对象，确定宣传的主题和重点。如在西方市场，主要表现香港的中国文化、夜生活、购物及香港的郊野生活，对东南亚及日本，重点宣传的是香港现代化的形象及新辟旅游胜地。此外，还派出代表团及名目繁多的“大使”到各地访问，诸如以香港小姐为代表的礼貌“大使”，以香港留学生为代表的学生“大使”，向海外宣传香港旅游业大兴礼貌之风等情况。1988年，香港旅游协会举办了第21届“学生大使计划”，让100名前往海外专上院校留学的香港学生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课程，其中包括讲课、旅游和专访，使他们更熟悉香港各方面的事物，以便在海外留学时，能深入地同海外人士介绍香港，促进香港的旅游业。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中国当代新美学的建立，须以开拓新哲学为总前导。新的美学趋向必将对美的形而上学和审美经验分析的一种历史性的扬弃，由此构成美学发展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环节。

关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的两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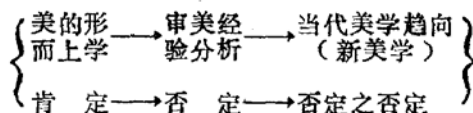
劳承万

一、展望中国当代美学新趋势的客观依据

对美学发展趋势的展望，要把握住两条线索及其汇聚点：一是美学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是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多维渗透。前者为纵向轴，后者为横向轴，二者构成的“座标”点，是为展望的焦点。

先从美学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说起。

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真正开端，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德国美学，也可称作“美的形而上学”。而对“美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审美经验分析”（“美感经验”分析）。“审美经验分析”作为一个总体，它包括20世纪诸多美学流派，如移情说，距离说，心理分析美学，格式塔美学等等，以“审美经验”为核心，多视角地切入了美的微观世界。审美经验分析作为对美的形而上学（肯定）的否定，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从“肯定”（“美的形而上学”）到否定（“审美经验分析”），是一种前进，尽管是“螺旋式”的，但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否定（是即是，非即非）。我们要分析（或预测）当代美学发展的新趋势（包括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新趋势），就必须对审美经验分析（“否定”）进行全面的反思。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预测，也才能从否定进展到“否定之否定”（新趋势）的环节。这条简单的历史线索和辩证原理即：



审美经验分析作为辩证矛盾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有什么东西值得保存？又有什么东西需要抛弃？它的二重性表现在什么地方？这需要一番艰苦、细致的分析工作，但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从美的形而上学（“肯定”）到审美经验分析（“否定”）的历史过程，我们通过前人的总结，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其间的肯定与否定要素，即扬弃的主要方面。美的形而上学作为特定的历史总体，具有自身的二重性：其保守方面是关于“美的本质”的贫乏性抽象；其积极方面，是思考“美的本质”的超现象、超感性的抽象思维方式，及其所揭示的“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内在联系。在审美经验分析环节中，则摒弃了美的形而上学的保守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它的积极方面。审美经验分析作为特定的历史总体，它也有自身的二重性：其保守方面是陷于“现象网”的无限描述之中。作为经验现象，总是一种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如果不能从其中超拔出来，总有“一叶障目，不识泰山”之弊；其积极方面是，它作为一个历史总体，组构了三个有机层面，积淀了人类现代的感性文明。这三个层面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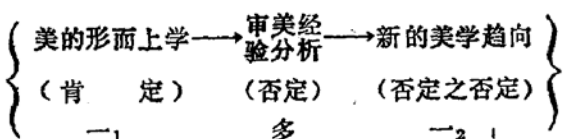
1. 从生理—心理方面，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人类审美机制，特别是深层机制。

2. 以艺术现象为客观载体(审美对象),把艺术文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以艺术文明确证与反照了人类文明的超越与神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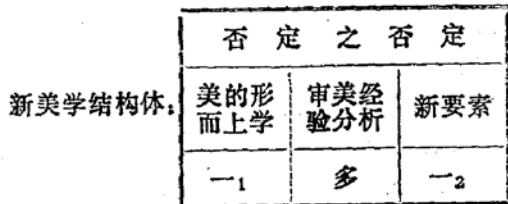
3. 从审美机制出发,过滤艺术现象,见出了人类审美心理结构的独立形式(抽象形式)——审美态度。

以上三个层面可分别简化为:生理—心理层面,或审美机制层面;艺术文明层面,或对象性层面;审美态度层面,或审美心理结构层面。作为辩证关系中的否定环节,审美态度层面比较集中地保存了肯定环节中的积极方面(思考“美本体”的抽象思维形式),摈弃了肯定环节中的保守方面。

换一个角度,从哲学思辩关于“一”与“多”的关系看,如果说“美的形而上学”(肯定)是“一”,那么,“审美经验分析”(否定)则是“多”。这是关于本质—现象的逻辑分析。由此可以推测,“否定之否定”的环节,应该对应于“一”,即由“多”复归于“一”。不过,这个“一”已经不是“肯定”环节中的那个“一”(即“一₁”,而是增殖了的、扬弃了“多”的“一”(即“一₂”)。以图示之:



按照辩证法的原理,后一个环节应当是前一个环节的保存与扬弃。那么,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环节——“新的美学”(或美学新趋向),则应该既蕴含第一个环节(肯定)的合理性(即使已融合在第二个环节中,成为有机的部分),也应蕴含第二个环节(否定)的合理性,此外,还要有它自身的合理性——自我创造要素,即新要素。如果我们把“新的美学”作为一个历史成果,其形式表层要素应该是三重结构体(从本质生成看,是二重结构体,因为在否定环节中保存的肯定环节合理性,已转换生成为另一整体了),如图所示:



探索所谓“美学新趋向”,设计美学的未来,我以为就应该遵循贯穿于这个结构体的两大

原则:

1. 新要素(新趋向)必须是对美的形而上学和审美经验分析的一种历史性、必然性的扬弃,由此构成“否定之否定”的环节,才能纳入辩证矛盾的发展历程中,否则,就免不了是一种主观性的随机猜想。

2. 新要素(新趋向)必须是对肯定环节的一种复归,即由“多”而“一”(扬弃了“多”的“一”,即增殖了的“一”),它(一₂)要求与“一₁”有等价的抽象思维形式,摆脱现象网的沉重纠缠,升华到新的领域。

只要遵循以上两个原则,我以为就可以鉴别目前出现的种种观点与口号。例如,目前“应用美学”的普泛化,到底是不是美学的新趋向?主体性美学、自由美学、艺术纯粹分析美学等等,是不是新趋向?如果把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新趋向,不加分析、生搬硬套地塞入西方美学发展轨道的第三环节(否定之否定)中,当然为时过早,但也不妨以这一轨道作为一个参照系、一个历史背景来讨论一下我们的方向。我以为,“应用美学”仍是辩证矛盾发展中的“多”,而不是“一”,不能纳入“否定之否定”的环节规范中。同理,主体性美学、自由美学等等,虽属“一”的范畴,有许多合理成分,但离开美学史中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路线规范、制约,即离开美的形而上学→审美经验分析→新的美学的历史发展轨道,是舍弃了历史的一种主观躁动。

那么,结合到中国当代美学,“新趋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这篇短文只能简单勾勒几句。中国现当代美学,真正的起点也许是始于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从当年讨论的“美的本质”论(美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到今天的审美心理分析、应用美学等等,走完了西方人的两百余年的美学历程。一方面,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发展,不管怎样特殊,都离不开世界美学发展历程的总规律(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中国现当代的美学发展也有点象跑龙套一走过场。我们当年的“美的本质”讨论,是在“批判”、“检讨”的轰隆声中进行,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近似康德、黑格尔式的人物和《判断力批判》、《美学讲演录》式的伟大著作(笔者无意抹煞当年的赫赫成就,以及从中成长起来的美学家);近年来的审美心理研究尽管成绩也不少,但又并不是真正科学性、实证性的

研究，某种程度上倒是一种“混合”。当然，谁如果硬要强迫20世纪末的中国当代美学离开自己的实际，塞入那个历史旧框架中，又从康德的起点开始，重蹈西方美学发展的历程，也是一种空想。因此，我以为当务之急是：一要补课（补“美的本质”论和“审美经验分析”的课），二要创新。在补课中创新，在创新中补课，用比较短的时间走完西方的美学历程。在没有走完西方美学历程的情况下，要侈谈什么新趋势，这和高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样有偏颇。“新美学”，是否存在一个“初级阶段”？

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急于找到“新美学”（新趋向）的具体内涵和实现的途径，而是明确方向，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是什么？就是在重建哲学中开拓新的美学。

上面谈的是未来“新的美学”聚焦点的纵轴线，我们还必须抓住其横轴线——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的影响、渗透，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座标”。

有识之士一致公认，美学（尤其是现代美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科学”，美学的任何进展，都离不开哲学、心理学、生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成果。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美学不是“物”的美学，而是“人”的美学。近年来，多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中心议题都集中在“人”身上，这是哲学——作为时代的神经——对现时代历史走向的一种灵敏的反应。作为“人”的自然科学，当然也应当“反射”出“人”的丰富性，并且通过美学的“聚光镜”放出更灿烂的光辉，这就是马克思当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刘丕坤译本第82页）。既然，现当代各门科学的“聚焦点”都是“人”。我们在展望“新美学”的时候，“人”本身的最新发现、“人”本身的成果，也应该包含在“新美学”的有机体中。这方面的话题太长，于此从略。

二、扬弃旧哲学，开拓新美学

目前美学理论界有一种呼声，要求美学摆脱哲学的控制，要求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对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我同情他们的情绪，但不同意

他们的看法。他们对旧哲学的那一套东西早已领教够了它的束缚与禁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没有把旧哲学与新美学的关系弄清楚，把孩子与污水一起泼了出去。古今中外的美学史都证明了美学从来都是哲学的组成部分，要美学摆脱对哲学的皈依实在是不可能的。一个时代的哲学产生一个时代的美学，具体到一个哲学家（例如康德、黑格尔）身上，也莫不如此，这是一条规律。我们所处的矛盾，即旧哲学与新美学之间的矛盾，叫做旧婆婆与新媳妇的矛盾。如果要当新媳妇，就得改门从新，抛弃旧婆婆，这是毋庸置疑的道理。哲学与美学的脱节，正是美学的真正危机。没有康德的哲学，哪有康德的美学？没有黑格尔哲学，哪来黑格尔美学？在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内部，严格地说，什么都不是，它只是哲学，一切都从属于这个哲学体系。要是拆散开来，把它们叫做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等，那是第三者的授予（出于纵向学科的归属）。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美学，才能把握住美学的生命及其有机性。多年来，我们的美学只是嫁接在非母胎的哲学上，所以，一有风吹雨打，它就倒霉了。

教条化哲学，仅仅是挂着门牌的哲学，美学也是从门牌哲学的个别教条中推演出来，或者干脆也是门牌美学。哲学、美学，其实都是一种生命的追求，是血与泪的奋斗，胡风当年在谈文学的时候，都深深地悟到这一点。可是这一“悟”，便惹来终生大祸。这就是美学长久嫁接在非母胎哲学上的原因。

美学的“嫁接”性质应该彻底改变，使之变为“再生”性质。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新的哲学，象马克思当年那样，来一个综合性的“大批判”。一切都为现实服务，一切都为“初级阶段”的“人”服务，在实践中创立我们的新哲学（以马克思哲学作灵魂）。这种新哲学应该是探索“人”的哲学，是使人的“精神结构”得到优化的哲学，而不是僵化的经典注释学，更不是为我所用的剽窃空话。

哲学有两个功能：一、使人聪明，二、给人带来希望（哲学教授们说，是加强主体自觉性、有的则说是建立世界观）。这两点功能对于个体（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就是变更和塑造精神结构，并依历史之可能，使之优化。这是古今中外的哲学的目的和用途（哲学的原义就是爱智的学问）。这种优化的精神结构，是人的身心得以平衡的根本力量，是人的存在的真正内

。这种精神结构一旦失去平衡，就会产生精神危机，今天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不是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这个真理么？所谓优化的精神结构，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既要“入世”，又要“出世”，一个人只有“入世—出世”相结合，才能成为一个现实的人，真正的人。缺失其一，则是残缺的人。用西方人的话（或浮士德精神）来说，就是既要有“形而上”（简称“形上”）的超越追求，又要有“形下”的现实享乐（现实态度）。“形上”使人获得精神自由（上帝品格），“形下”使人得到物质解放（魔鬼习性），这是人的精神结构中两个不同的层次（仙子与魔鬼）只有优化的精神结构，才能教人聪明，使人充满希望。

我不大赞同时下的二极性价值观：有的人只求“入世—形下”的现实享受，做一个“经济”人；有的人只求“出世—形上”的超越，做一个“思想”人。前者太实，后者太虚。不过，目前的主要倾向、和主要危险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大力提倡“形上—出世”的超脱精神（面向精神结构的最高层次），却大有意义，因为它是人的精神结构优化的前导力量。但是，所谓“形上—出世”的精神品格，并不是那种极左式的对偶像的忏悔，更不是假、大、空的那一套；当然也不是追求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

就美学来说，这种“精神结构”二层次的关系，是怎样体现的？

对应于哲学，美学也应有塑造人的精神结构的两个层次，即“形上—出世”的审美追求，和“形下—入世”的审美应用。两者相辅相承，在某个时期允许有所侧重，但终究要聚合之后，才能跃向另一高峰。由此看来，时下人们对“美的本体”（重提柏拉图的这个范畴概念很有必要）的追求过冷，而对于美学的应用（有人称之为美学泛化），则又过于火热。对于应用美学的泛化，我们比较容易领会其中的秘密，人们热衷于它，也许是因为有某种“装饰”作用或时髦色彩、或经济价值……但对于“美的本体”的形上追求，其间的奥妙却难以说清。然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仍从哲学说起。目前我国哲学界在“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的怨怒声中奋起，也开始大谈“哲学改革”了。有的人仍是主张“哲学是关于世界……的学问”，哲学所获得的是离开人的

“物”的世界图景，千万不能“空想”，要“联系实际”（这个口号喊了几十年），归根到底，哲学要作解释工具或诱导手段。而另一些人则超脱得多，甚至提出了“哲学无定论”的解放思想。这是武汉大学陈修斋教授的观点（其实，1948年贺麟先生便提出过：哲学“纷无定论”的观点）。陈教授说：“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如果一旦有了定论，则它是科学问题，而原本并不是或不再是哲学问题了”。这类“无定论”问题，集中体现在康德哲学的“二律背反”问题中（见《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对这种“无定论”问题的思考和追求，就是一种“形上—出世”的超脱。人的审美追求只有奠基于此种“无定论”（“纷无定论”）的“形上—出世”追求和超脱中，才显示出它自身的永恒性。美学所追求的，除了对美学的“形下”应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进入审美的神圣而又神秘的境界，这是真、善、美浑然一体的崇高境界。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就说过：“人生最高的境界，是审美境界。审美境界类似于宗教信仰，但又不等于宗教信仰。所谓“类似”于宗教信仰，就在于进入审美境界之后，人们沉浸于“美的本体”之中（这点柏拉图形象地描述过）；所谓“不等于”宗教信仰，就在于进入审美境界之后，并不抛弃与失落人的自身，人们得到的是美感，而不是失落感。如何培养人进入审美境界，这是审美理论的重大历史课题。

我以为，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趋向，应该是多些追求“美的本体”，大力补一补当年康德、黑格尔论述关于“美的本质”的课程，当然也要补一补“审美经验分析”的课程，只有把这两门“课程”补好之后，审美应用的路子才不会歪斜。

当前我国美学发展的趋向与当前我国哲学发展的趋向，可以说是大体一致的。哲学的经典注释性，以及充当假、大、空的论据，使其失去哲学自身的庄严；美学应用的过分泛化，以及充当“装饰”和赶时髦的论据，亦使美学失去其本色。我国理论界当前的任务，应当是促进改革的人们迅速获得优化的精神结构（“形上—出世”的审美追求与“形下—入世”的现实态度相结合），去迎接伟大的历史任务；用它去突破传统，也用它去迎接未来。在开拓新的哲学历程中，重建美学。

人们不禁会问，这样的美学发展趋势，有多少现实依据？优化人的精神结构是主观设想，还是现实需要？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历史。近十多年来，中国当代美学的长足进步，不外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国哲学和心理学的广泛渗透，一是国人对精神解放的热烈追求。近年“审美心理”的研究洞开了一条金光大道，广泛引起人们的注目。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虽然是两门独立学科，但其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其实，心理学和美学原都是哲学的一部分（现在人们把心理学归到自然科学，它们之间也是“兄弟”关系。当然，现代哲学的发展也得益于心理学、美学的发展，这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已有清晰的显示，在皮亚杰那里，更是浑然一体的东西。哲学—心理学—美学的关系一旦沟通，人们就会看出，它们之间有一种互逆关系。近现代及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也有一个以哲学—心理学为背景的传统。如王国维的美学就渗透了尼采、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精神，朱光潜美学就渗透了克罗齐哲学—美学（以及西方其他各派心理学）的观点，一代“解放牌”学者的美

学，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美学以及苏联心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发扬这个传统，我们必然追求“形上一出世”的审美境界，更新我们时下沉滞的“精神结构”。这是未来目标的明显指向：只有开拓新的哲学，才能建构新的美学。

中国当代美学欲完成优化人们的精神结构的神圣使命，就得以开拓新哲学为总前导，强化人们的“形上一出世”的自觉意识，控制和摆脱美学应用的过分泛化。此外，我们必须明确：哲学、美学总是人的一种超前意识的凝聚，是“现实意识”的升华，从本质上说，是“生命的欲求”，是一种向前运动的“力”。把这种“生命欲求”和那向前滚动的“力”整合起来，导向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目标，从而使“人”获得一个优化的“精神结构”，将“人”提升一格。这也就是“美本体”的呼唤。

作者单位：广东雷州师专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逻辑范畴系统的涵义、结构和功能

王 经 伦

着眼于逻辑范畴系统建立独特的、整体性的辩证逻辑思维形式，是一种新的探索，很可能是辩证逻辑思维形式研究的突破点。因此，回顾逻辑范畴系统问题的提出，探讨逻辑范畴系统的涵义和层次的、整体的结构与功能，是很有必要的。

1

重视逻辑范畴系统、以其作为辩证逻辑独特的、整体性的思维形式的思想，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在一段时期里，一些逻辑工作者以包含了辩证矛盾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具体概念、辩证判断、辩证推理）作为辩证逻辑自身的思维形式，以为这就可以跟排斥矛盾的、相互间是并列关系的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区别开来了。后来，人们逐渐觉察到，这种思想遇到了两个难题：

首先，无法如愿区分两种逻辑不同的思维形式，无法确定辩证逻辑学科的独立性。这种以包含辩证矛盾的概念、判断、推理作为辩证逻辑思维形式的思想，从主观愿望上说，是要分清两种逻辑不同的思维形式的。但从实际效果看，根本不能达到区分两种思维形式的目的。因为，包含辩证矛盾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从思维形式上说，始终还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丝毫不能改变它们原来的性质。既然两种逻辑

同以概念、判断、推理作为思维形式，等于说辩证逻辑不存在自身特殊的思维形式。

思维形式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由此进一步带来的，是无法肯定地回答辩证逻辑到底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问题。

其次，无法解决非辩证的思维形式与辩证的思维内容的矛盾。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顾名思义是表达辩证逻辑思维内容的方式，那么，它应该是揭示思维内容运动过程的、联系发展的、以整体面貌呈现出来的形式。但这种包含矛盾的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不能以自身中的矛盾为动力、以其间的相互联系为媒介，进而综合为整体性的思维形式，反而把本来是整体性的辩证逻辑思维形式人为地分割为各个部分，然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把这些被分割的部分固定下来了。名义上概念、判断和推理能“相互过渡”，实际上根本不能通过思维形式反映出其过渡性，而往往是以包含在概念、判断、推理中的具体内容的过渡代替、掩饰了思维形式的过渡，始终是单个的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概念、判断和推理仍旧是处于凝固的、并列的状态中，归根结底是非辩证的思维形

式，其结果只能窒息辩证逻辑的思维内容的运动和发展。

辩证逻辑的思维内容要求有适合自身的表达方式，名实相符的辩证逻辑思维形式才能适应这种要求。显然，唯有另辟蹊径才可找出这样的思维形式。以逻辑范畴系统作为辩证逻辑独特的、整体性的思维形式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一种新的探索。

所谓逻辑范畴系统，是通过系列性的逻辑基本范畴，反映思维对象整体的、整体与其要素、层次和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运动、发展的思维形式系统。这个定义指出：

第一，逻辑范畴系统是辩证逻辑思维形式的标志。如前所述，形式逻辑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尽管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在其逻辑著作中提出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处所、时间、状态、姿态、活动和遭受等十个逻辑范畴，但后人始终拒它们于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之外，以至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出版的形式逻辑原理书中，仍然避而不谈逻辑范畴问题。数理逻辑是运用数学中的形式化语言方法研究演绎推理的。唯有辩证逻辑才研究逻辑基本范畴及其系统问题。可见，逻辑范畴系统是辩证逻辑独有的思维形式。

逻辑范畴系统与唯物辩证法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所强调的思维形式中的运动、联系、发展是以唯物辩证法范畴为指导的结果。另一方面，通过逻辑范畴系统表达了思维领域中的特殊辩证法范畴，从而丰富、发展唯物辩证法范畴。

逻辑范畴系统的形式与其内容具有协

调性。在逻辑范畴系统中，不但表述了辩证逻辑的思维内容，同时还揭示了内容中固有的运动、联系和发展的形式，使思维内容中的辩证法在其形式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内容具有适合自身的表达形式之后，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逻辑范畴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一词带有整体之意。根据这一思想，逻辑范畴系统是个有机的整体，它要求我们要从范畴系统出发，去研究辩证逻辑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思维形式；对其中的各要素、层次等，应从逻辑范畴系统构成的角度考察与它们的关系、其中所起的作用。总之，是从逻辑范畴系统的高度揭示辩证逻辑整体的思维形式运动的轨迹和规律。

这种整体性说明，逻辑范畴系统的整体大于其中各要素、层次和部分之和，整体自身固有的结构和功能，是其要素、层次和部分所不具有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整体性的辩证逻辑思维形式简单地归结为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机械相加，以为把它们捏合起来也就是辩证逻辑全部的、直接的思维形式了。否则，是无法揭示整体性的思维形式的。

逻辑范畴系统的整体性是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区别于形式逻辑思维形式的重要特性。整体性表明既研究范畴系统这一整体，又研究组成该整体的要素、层次和局部；既研究对范畴系统的综合，也研究对范畴系统的区分。其研究的思维进程是从整体到要素、层次、局部，从综合到区分。这与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形式的组成部分，只强调把思维形式区分为局部孤立地考察的特性具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具有整体性的辩证逻辑思维形式比形式逻辑

的思维形式高一层次。

2

既然逻辑范畴系统是整体性的思维形式，必然有其自身的结构。可从纵、横的不同方向揭示其结构。

纵向结构概括为具体概念——辩证判断——辩证推理——范畴系统。具体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的整体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层次。它的功能是用语词概括思维对象，为形成各种判断、推理等提供素材。辩证判断是同时断定思维对象的性质、关系、模态等多样性的思维形式层次。具有阐述对象、为各种推理、论证提供素材功能。辩证推理是根据辩证判断之间的联系，从中推出新知识的思维形式层次。其功能是进行科学解释、提出科学预见。

在上述的具体概念、辩证判断、辩证推理和范畴系统的各层次中，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关系：越是往后的则越是高级的层次，而最后的则是最高级的层次。这是由于越往后的层次越接近范畴系统，而最后的层次本身就是范畴系统。

逻辑范畴系统通过自身的纵向结构协调了与具体概念、辩证判断、推理的关系。具体概念、辩证判断和推理虽然不是辩证逻辑整体性的思维形式，但人们进行辩证思维时，又必不可少地要运用它们，这就出现了如何处理逻辑范畴系统与具体概念、辩证判断、推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纵向结构的思想，则可以把具体概念、辩证判断和推理纳入范畴系统的整体中进行阐述，从整体与层次的角度处理它们的关系，从而使二者融为一体。

逻辑范畴系统的横向结构是基本范畴——范畴系列——范畴系统。基本范畴是

反映思维对象最基本的规定、关系以及运动进程的思维形式档次。它从某一方面、角度对思维对象进行最高层次的逻辑概括。范畴系列是概括同类基本范畴的思维形式档次。包括揭示思维对象规定性的、揭示思维进程和关系的两系列。一是揭示思维对象规定性的系列。凡被摄入思维领域的客观事物、主观理念、信息，乃至思维自身都属于思维对象。有关它的规定的范畴系列，是表征思维对象的各种存在性（相对于非存在而言）的。二是揭示思维过程和关系的范畴系列。这是深入到思维对象的规定性的范畴系列之中，展示思维产生的原因、条件、根据、与有关方面的联系、自身的各种推演关系以及结果等，从中说明辩证逻辑思维的动态和开放性。

在上述纵横结构的各层次、档次中，存在着过渡的关系：由具体概念过渡到辩证判断，从辩证判断过渡到辩证推理，再从辩证推理过渡到范畴系统。在横向结构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过渡关系。这是由于单个的基本范畴只能从一个方面或角度揭示思维对象最基本的规定、关系和运动进程，而对象的最基本规定、关系等往往是多方面的，运动进程常常是曲折的，这就需要通过范畴系列才能全面地揭示出来。由此产生了基本范畴向范畴系列的过渡。思维对象的最基本规定、关系和运动进程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运用多个范畴系列才能同时反映出思维对象联系的整体性。于是形成了范畴系列向范畴系统的过渡。由此可见，逻辑范畴系统的整体性是通过其结构中各层次、档次的过渡性而实现的。

逻辑范畴系统除有层次性的功能之外，同时还具有整体性的功能。概括地说，其整体性功能在于帮助人们取得各种系统性的知识。

首先，它是把握思维对象的整体性的工具。思维对象自身是个整体，在思维过程中，只有以同样是整体性的思维形式为工具，才能揭示思维对象的整体性。人们借助逻辑范畴系统这一工具，把对象各方面的规定性，产生、发展的过程性，内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综合的统一的有机体，从中全面地、详尽地进行阐述，达到把握对象整体的目的。

其次，是寻求真理的途径。寻求真理是辩证逻辑、包括逻辑范畴系统的根本任务，而符合真理要求的思维形式才能引渡人们找到真理。列宁说过：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全面的；真理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这就是说，真理要求反映出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性、全面性和整体性。此外，列宁还说，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那是说真理要求其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反映出其特定的内容和形式。显然，逻辑范畴系统是符合上述的真理要求的，它是人们追求真理的途

径，沿着这一途径，人们终究能找到真理。

再次，可指导人们构造科学知识的理论体系。人们需要以科学知识的方式概括思维活动的成果，而科学知识往往是以理论体系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在理论体系中，人们总要遵循一定的思维形式阐述有关科学知识的研究对象的各种规定、产生和发展过程、内外关系等。逻辑范畴系统为科学知识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思维形式，对于建立各种科学知识的理论体系，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最后，它有助于建立有关系统科学的理论。当代科学研究中遇到的新问题，是如何用一些新思想、新原则和新方法在更高的层次上对现有的科学知识进行综合、概括，以形成有关系统科学的理论。很明显，企图以孤立的组成部分去说明系统整体的那些思维形式已无能为力了，只有运用同样具有系统、整体性的思维形式才能胜任。因此，逻辑范畴系统有助于人们建立有关系统科学的理论。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范英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

张系朗

人们一般都认为：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所谓“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指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总和，而不是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跟过去旧生产关系的残余以及未来生产关系的萌芽拼凑在一起。”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这实质上是说，经济基础就是**一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是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相应的，所谓上层建筑，也必然是单一的，即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

上述观点，长期以来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却为我们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十三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本文所引文字，凡不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十三大报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经济、私人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不但应该允许它们存在，而且应该“鼓励它们发展”。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必然是“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至于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可能都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而必然“存在雇佣劳动关系”。

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地存在着多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它们都是构成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因素之一，因而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必然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其中，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是整个经济基础的主体，它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性质和

主导方面，但其他的经济成分、生产关系，也必然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影响。首先，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必然会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会产生或助长种种私有观念。其次，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也必然会影响我们的政治生活，例如它会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使得我们不能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初级阶段的法律规范，相反我们还必须制订出保护它们合法利益的法律和政策；又例如，它还会在我们的政权建设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即我们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机构以及各种群众团体，都要吸收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参加，即必须允许他们参政。

人们或许会说：诚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确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但这只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一种短暂的现象，因而不应该把它概括成为普遍的理论。我认为不然。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短暂”，在我国，它“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试问，作为生活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人们，对于至少在上百年时间里一直存在的历史现象，难道还不应该进行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吗？其次，“综合经济基础”决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这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经济基础也必将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再次，纵观一部人类历史，真正单一的经济基础，大概只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早期、中期和将来高级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至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差不多都同时存在着当时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过去旧生产关系的残余或未来新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些“主体”、“残余”和“萌芽”，都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都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

二

由于过去长期坚持“单一经济基础”论，在实践上造成了严重的结果。

首先，在经济上，形成一种普遍的理解，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唯一合法的经济基础，而其他一切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则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异己的、敌对的力量，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一再“割资本主义尾巴”，盲目求纯，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追求一大二公，结果导致了僵化的经济模式，严重脱离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次，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那些在理论上主张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同志，那些在实践上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被当成了修正主义者、走资派、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乃至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再遭到批判和打击，严重破坏了党内团结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导致政治运动频繁，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单一经济基础论在理论上造成了许多的混乱：

第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

人们回答说：“在阶级社会中，它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对抗和冲突，不可能由旧社会制度本身来解决，只有经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二者既相适合同又相矛盾，而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阶级社会”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性质吧。如果经济基础仅仅是一定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如果上层建筑也仅仅是在这单一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自己的上层建筑，那么，即使是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同自己的经济基础也必然是基本上相适应的；二者之间当然不可能没有矛盾，但绝不会是对抗性的矛盾。难道剥削阶级会建立一套同自己的经济基础“相对抗”的上层建筑吗？难道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以及由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构成的意识形态，是同封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相对抗”的，而不是为它们服务的吗？

人们还可能这样来解释：“当生产关系已基本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维护旧经济基础的腐朽的上层建筑，就和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要求之间发生尖锐的矛盾。”^③这样的解释也是似是而非的。首先，这里讲的是“腐朽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要求”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同经济基础本身的矛盾，因而已经不是我们原来要讨论的命题了。其次，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要求”到底是什么力量的要求？这既不可能是这一经济基础本身的要求，也不可能是这一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要求，而只能是这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物——新的生产力的要求，只能是代表这一新生产力的新阶级、新思想的要求。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末期，要求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只能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生产力，只能是代表这一新生产力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其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旧经济基础同这些革命因素之间的矛盾当然是对抗性的。但是这样一来，命题本身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已经由原来的“经济基础同自己的上层建筑是對抗性的矛盾”的命题，转换成了这个样子：经济基础同敌对力量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这就违背了概念的同—性原则，因而是科学的。

第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坚持单一经济基础论的同志回答说：

首先，“这是由每一个社会都包含着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经济成分这种复杂情况决定的。经济基础方面新旧掺杂，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也就不可能是纯粹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都不可能是单纯的。这里有新经济基础和旧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还有新的上层建筑和旧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④这里明显地存在着理论上的混乱：当着人们给经济基础下定义时，说经济基础只是一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跟过去旧生产关系的残余以及未来生产关系的萌芽拼凑在一起”；但当着人们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却又说经济基础是“新旧掺杂”的，因而上层建筑也“不可能是单

纯的”。在这里，要论证的论点是：单一的经济基础和单一的上层建筑之间为什么会产生矛盾；但用来论证的论据却是：因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综合的”。这样的论点和论据是明显脱节的。

其次，“这是由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造成的。……旧的思想意识在新的经济基础上（1）建立起来以后，自然会保存很长的时间。……这就使它和新经济基础不能不发生矛盾，而且不能不延续很久。”⑤这里的情况同上面完全一样：要论证的论点是经济基础同自己的上层建筑之间为什么会产生矛盾；而论据却是经济基础同敌对的社会意识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

第三，如何理解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性质？人们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大小和好坏，取决于它和经济基础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它对基础就起积极作用，越是适应，积极作用就越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背离，它对基础就起破坏作用，越是背离，破坏作用就越大。”⑥如果坚持“单一经济基础论”和“单一上层建筑”的观点，这段话也是说不通的。这种单一的上层建筑同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必然是基本上相适应的，必然是起着积极维护作用的；至于它同自己的经济基础“相背离”、“起破坏作用”，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相背离”的、“起破坏作用”的，不是指自己的，而是指敌对的上层建筑，那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在逻辑上同样犯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毛病，违背了概念的同—性原则，命题本身也同样无形中被改换了。

第四，在阶级社会中，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是否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人们说：“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如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样，也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⑦

在前社会主义的阶级社会里，一般说来，剥削阶级是当时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而劳动阶级则是当时生产力的代表者；因此，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是千真万确的。但如果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同样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么，在坚持单一经济基础和单一上层建筑的前提下，却是无法说通的。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里，代表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并不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而是同一个剥削阶级。这

同一个剥削阶级，既掌握着生产资料，同时也掌握着国家政权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试问，这个剥削阶级自己同自己怎么会有什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呢？由此可见，在坚持单一经济基础论和单一上层建筑论的前提下，人们是不应该把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质等量齐观的。

三

如上所述，单一经济基础论的确在实践上与理论上造成了许多的混乱。那么，消除这些混乱的出路何在呢？我们认为，出路就在于，遵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遵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的科学规定，明确地承认：经济基础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同“综合经济基础”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在本文的前半部分已经作了分析和说明。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的科学规定：“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引者注）”。⑧很显然，马克思这里是把“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或者说他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一个层次上来使用“生产关系”这个概念的，而不是着眼于生产关系之下的另一个层次——构成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正如同他在这里所说的“物质生产力”是指“物质生产力”这个整体，而不是指构成“物质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一样。但是，当人们把经济基础确定为“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总和”的时候，实质上却把马克思所说的“这些”和“总和”四字一笔销了。由此可见，“单一经济基础”论是同马克思的原意相违背的，而“综合经济基础”论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基础本来就是综合的，是由一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残余状态的或萌芽状态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这也正如恩格斯明确说过的那样：“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包括“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⑨

既然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那么相应的，上层建筑也必然是综合性的，即必然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上层建筑并存于同一个社会形态之中。当

然,这里所说的“多种不同性质的上层建筑并存”,是指多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并存;至于国家政权、法律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那是不能“多质并存”的,而只能存在那种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这是因为,残余状态的和萌芽状态的生产关系,毕竟不是完整形态的,所以它们也就不可能拥有完整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能拥有某种社会意识形态。

从综合经济基础和综合上层建筑的观点来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可能是单线条的,而必然是立体的、错综复杂的。其中,既有经济基础内部不同生产关系、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也有上层建筑内部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既有每一种生产关系同自己的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也有每一种生产关系同敌对的意识形态

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那些理论上的混乱,就可以逐步地消失了。

- ① 杨焕章主编:《简明哲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
- ②、③ 《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 ④、⑤ 同①第426页。
- ⑥ 同①第425页。
- ⑦ 同①第427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 ⑨ 同⑧第4卷,第505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泰安师专哲教室
责任编辑:范英



国外高教经费管理制度和 我省高教经费管理体制的改革

杨移贻

黄循洛

面对我国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事实，增加投入固然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当务之急，而加强经费管理，改革拨款方法，使有限的投入发挥更大的效益，这同样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方面，国外一些做法很有借鉴意义。

一、国外高教经费管理的一些情况

国外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大致分三种类型^①：第一类以地方管理为主，是分权型，如美国、联邦德国、南斯拉夫等。美国教育实行分权管理，以州政府为主。联邦教育部负责管理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监督、管理教育拨款，确定教育经费的范围和重点（如管理和分配国会拨给各州的教育经费，根据国家的特殊需要，直接向公立或私立学校拨款，对各类学校的捐赠收入实行免税管理，分配联邦的资助等）。各州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本州的教育经费（如编制由州政府支付的教育拨款预算，管理州立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以及各高校通过接受专项科研、开设专门课程和资本支出所获得的资金，分配和管理对私立学校的资助等）。联邦德国的教育和科学部主管对教育的资助，包括大学的建设费（扩建和新建大学时，联邦补助其经费的50%）、育

英奖学金、职业教育训练费、标准实验费等。同时，联邦教育和科学部要对各州的教育经费管理进行监督，州教育部则负责分配和管理本州的教育经费，一是负担、管理州内所有公立学校的教员工资和其他人事费用，二是管理对私立学校给予的必要的财政补助，如有关学费及教材的补助，对学校经费、正式教员的养老金以及遗属的抚恤金补助等等。地方县、市教育行政机关，负责管理校舍维修，物品和教材的购置等。私立学校的经费由办学单位提供及管理，也可得到州的资助。

第二类是中央管理与地方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亦称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如日本、英国等。日本由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和学校法人开办学校，分别称为国立学校、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学校教育法》规定，学校开办者应负责管理其开办的学校，并承担经费。中央行政教育机关文部省负责对各种国立学校的投资和管理，并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进行经费补助和管理。地方教育委员会分为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和市町村教育委员会两级，负责管理各种公立学校及社会教育的经费，所有私立学校的经费则由学校法人负责筹集和管

理,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补助金向私立学校提供资助。英国的教育经费主要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共同管理。根据中央支援地方的方案,中央的教育科学部要承担60%的教育经费,同时负责其分配并监督使用。地方教育局要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经费进行统筹安排、管理,并接受中央教育科学部的监督。

第三类是中央集权型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如苏联、法国等。苏联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国家预算,高等教育拨款计划,必须由部长会议批准,由国家教委及相应的对口单位负责分配和管理。法国的教育经费80%以上由国家的国民教育部负责分配与管理。

从国外三种类型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看,中央集权型便于对全国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和宏观管理,但不利于调动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在统一分配教育经费时,容易搞平均主义,而不是按地方需要办学。分权型有利于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紧密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办学。但国家管理权过小,难以统筹全国教育经费的宏观管理,而且地方的负担往往过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则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级办学的积极性。通过中央政府可以平衡全国教育经费的分配,对落后地区给予必要的补贴,通过地方政府,可以挖掘地方办学的潜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对教育经费使用的控制管理,各国不同的做法。一些国家和地区尊重高等院校的自治权,政府对各校经费的使用不作具体干预,只从政策、法令上实行宏观控制。如法国教育部管理高教经费,除科研费

单独列出外,其余根据大学的性质、规模等,每年一次分配拨给,学校可以自由支配国家提供的经费,国家则根据教育政策和法令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英国过去的高教公共经费拨款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一揽子拨款,政府拨款后对其如何使用不予干预。但政府在资金短缺、可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准备对高教公共经费管理进行改革,对高校拨款采用合同制,政府按具体项目确定拨款,并有审计制度审核经费的使用。学校要与政府签订合同,对使用这笔经费后的成果作出保证。能否履行合同关系到以后的拨款数量。^②美国则把高校财务管理同发展高教事业联系起来,以财务管理评价高教事业。美国高校在预算年度结束后,要根据“高等教育管理者协会”与“大学公证会计师协会”的规定,做出财务报告,目的是向拨款、捐款的单位与个人报告学校资金收入变化的情况,并作为编制预算的依据。^③尽管各国对高校教育经费使用的控制宽严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许多国家的教育法都明确禁止把教育经费挪作他用。如日本《产业教育振兴法》和《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中均规定,如果国家的拨款或补助金不是专款专用,则国家停止发放剩余的资金,并追回已发放的部分。^④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吸取。

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方法,国际上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很值得参考。一是成立专门的拨款机构。如香港政府设立的“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这是介于政府和大学之间的一个咨询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香港各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发展,审核各学院提出的财政需要,向政府提

供意见。政府的高等教育拨款的程序大致是：学校向资助委员会提交下一个三年发展计划建议草案，委员会访校听取意见；委员会讨论并综合意见后向各校董会提出；各校参考委员会意见对计划作修改，在此基础上估计所需经费；委员会再次讨论作出估价后向政府提交具体拨款建议；经立法局审查，批准拨款；由委员会向各院校发出拨款通知书，内容包括：未来三年的拨款的数目、委员会特别支持或不支持的提案、专项拨款的款额，以及委员会对该校工作表现的赞许和批评等。资助委员会由港督委任，但不是政府成员，而由香港知名人士和各地著名学者组成。^⑥英国也有专职的拨款机构，如“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和“全国咨询机构”（NAB）分别负责私立部分（大学）和公立部分（科技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拨款方案。^⑦二是搞好核算工作，合理分配经费。美国一半以上的州，为了保证政府部门拨款公正，采取一种“公式预算”法，教育拨款的参考依据，以学校不同科类、学分小时总时数及教师的工资为核算基础，扣除学费的收入，对教学辅助活动、图书、校务公用费等，则再乘以系数。^⑧南斯拉夫教育经费的分配是根据各级各类学校的工作、需要和发展远景确定的，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由共和国（自治省）给予补助，这种补助政策体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合理性，是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三是在拨款中引进竞争机制。英国政府为了提高高校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率，把研究经费同教学经费分开，并实行按项目招标，小的学院也可以同大学竞争投标。英国政府还为高校制定各种“表现指标”，根据其优劣面决定拨款的多

寡。如为促使高校更多地吸引私人投资，政府把各校吸引私人投资的多少列为学校“表现指标”之一，作为今后制定拨款方案的基础。

二、我国高教经费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和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样，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型的管理体制，即高教经费由中央财政切块戴帽下达，地方财政部门管理，教育部门安排使用。1980年教育经费管理调整后，教育经费改为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块切安排，教育部门使用。这种管理体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很不适应，其主要弊端是：（一）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没有法定的分配比例，在地方财政安排中往往要受地方领导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所左右，随意性很大。相当一部分领导对教育经费采取“剩余政策”，教育经费很难得到实际上的增长。（二）由于教育经费多寡是要在当年第二以至第三、四季度才能定下来，所以教育部门难以统筹安排，工作十分被动。（三）教育经费层层包干，各地区、各学校难以调剂余缺。（四）教育拨款与学校发展方向、教育质量、经济效益等没有挂钩，起不到对教育发展的宏观调控的作用。（五）教育经费管理不严，经费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挤占挪用铺张浪费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就广东省而论，省高教育局计财处负责省属高校经费的管理，每年向省财政厅申请高教经费，然后制订各院校拨款计划，并负责执行监督。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我省高教拨款方法，是“基数加发展”，即对每个高校定下一个拨款的基数，每年在此基数上按学校招生的增长量给予一定比例的

增加。由于这种严重平均主义方法弊端很多，1984年把拨款方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其中综合定额是把学校基本开支——包括教职工工资、福利、教学费用、实习费、助学金、设备经常费、生活设施费用等等，折算成一个综合定额（不同专业、科类、层次定额不同），按学生人数下达；专项包括外国专家聘请费、设备费、科研费、图书费、教工离退休费以及特殊专项等，另外根据各校状况，视需要与可能下达。这种拨款方法，破除了“基数加发展”的平均主义，鼓励学校增加招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弊病：（一）刺激了学校扩大招生规模，而缺乏对提高教学质量的调控。近几年高校出现招生失控、办学条件下降、教学质量下降的倾向，与此有一定关系。（二）助长了供给制思想的发展。由于专项尤其是其中的特别专项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高校便老是盯着这一部分，一些能够自己解决或应包括在综合定额开支的项目，也纷纷申请专项补助。（三）没有对学校编制起控制作用。现在高校“人头费”（教职工工资福利、学生助学金等）急剧上涨，使直接用于教学科研的“公用费”迅速下降。由于经费定额没有反映这两大费用比例情况，所以不能刺激学校改善其结构。

在一定意义上，“拨款就是政策”。在推进我省高教体制改革，实施高教发展规划中，必须重视拨款的导向作用，使之成为宏观调控的有力杠杆。

三、对我省高教经费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

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各级财政支出中应有一定的比例，并由国家和地方

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任务，是如何分配和管理这些经费，协调高校和政府的关系，统筹全省高教事业的发展。

我们对广东省高教经费管理体制的改革，总的设想是分两步走。

第一阶段，用二、三年时间，对现行制度进行调整，实行经费包干，其方法和步骤为：

（一）重新核定基数，即核定学校的任务（培养学生的科类、层次、科研方向等）、人员编制和发展规模。

（二）把原来的综合定额分割为人头费、公用费和基建费三大块，切块下达。人头费按编制、公用费按学生规模计算定额。公用费中的科研费可采取公开招标合同承包的办法，企业捐资、私人赞助和贷款作专项处理。

（三）实行经费包干，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原则。经核定后，“人头费”根据编制拨给学校包干，做到减人不减经费，增人不增经费，以利于学校削减冗员，防止编制无限制膨胀，又可使教师在超荷工作时多劳多得。“公用费”则按学生规模及不同科类层次的定额下达，学校超计划自行扩大招生部分不给经费，以便控制发展规模。

（四）各项定额基数核定后，省里逐年递增的高教投资，也按比例递增拨到高校。

第二阶段，创造条件成立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由此委员会负责全省高校的经费管理，初步设想其组织和职能是：

（一）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由高等院校的专家及管理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工

商金融界代表和部分公务员（包括高教管理部门，政府财政、人事部门等）组成，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各界推荐，政府任命。

（二）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对高校的经费使用负有咨询、监督、指导的使命，同时又是沟通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桥梁，其主要工作是：

1. 统筹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对除高校本身“创收”外的经费进行统筹，包括国家投资、地方投资、企业捐资、私人赞助、教育贷款等等，既从多渠道争取投资，又合理控制经费的使用

2. 委员会通过经常的人才需求调查和预测，结合国家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为高校提供有关信息，并审核高校编制的发展规划，根据全省高教发展规划通盘考虑，提出修改意见，对重复设置、效益不高，人才供求脱节的应予调节或取消。进而根据已经审核的高校发展计划制定经费预算方案，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下达。

3. 监督拨款方案的执行，以保证拨款按计划 and 按申报专项使用。为此，委员

会应协助组织对高校教学效果、办学效益的评估，有权对教学质量、办学效益提出质询，以便奖优罚劣，有效地使用经济杠杆。

（三）在健全省、市分级办学体制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办学体制的同时，省、市各级成立相应的拨款委员会，省拨款委员会负责省与市、市与市之间的协调工作，根据条件和条件，对困难地区或有专门发展意义的项目提出专项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 ①②④⑥ 国家教委教育经费研讨组编《教育经费与教师工资》，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
- ③⑦ 谷富林《略谈美国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外国问题研究》1988. 2。
- ⑤ 雷强等编《香港高等教育》，广东高教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广东省高教局

责任编辑：陶原珂



深圳市经济系列职称改革的初步经验

季纲岭

深圳市经济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的改革、评聘工作从1987年初开始至1989年初结束。这是深圳创办经济特区以来，首次对经济系列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职称评聘。在国务院及省有关文件精神指导下，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探索，我们基本完成了首批经济专业技术人员的评聘工作，并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

（一）从特区实际出发，贯彻改革精神，通过职称评聘促进经济管理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

深圳特区创办9年来，从各地招聘了大量专业人才。目前，特区人口一半以上是全国各地来的“新移民”，其中专业技术人才98%以上来自各地。同内地大中城市相比较，深圳特区的专业人才队伍有许多特点。一、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较为雄厚，总体素质较高，“杂交优势”尤其突出。据统计，参加这次经济系列职称评聘所涉及的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者占51%。不具备学历，但已从事专业工作20年以上者还有200余人。而在专业技术干部中，按政策属于这次职称评聘范围的4750人中，原来已有各类职称的人员只有3%左右，缺口较大，而上级下达的职称评聘指标有限，所以评聘工作压力很大。二、特区不少现职岗位与内地的不同，专业技术人员到特区后“转行”的现象较为突出，而且，他们的学历、以往的工作经验、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等状况，因地区、部门的差异而有较大出入，难以全面考察，其复杂性给职称评聘工作增加了难度。三、作为新事物的特区，一切工作均应贯彻特事特办的总原则。但实际上，职称评聘的所有文件、规定，均与内地相同，本

身并无特殊条例。所以，如何做到既要严格执行中央、省有关文件规定，又有利于特区建设事业的发展，兼顾特区的实际，这都给这次职称评聘工作增加了探索性。四、经济系列职称涉及面广，受评聘人员分布于工、农、贸等多条战线，难于按通常归口的办法统一评聘，协调工作亦有困难。

以上几个特点，决定了我们在贯彻上级文件时，必须从特区实际出发，坚持改革精神，才能较好地完成这次职称改革评聘的任务，达到促进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为此，根据市委的统一布置，这次经济系列职称评聘工作在三个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领导重视，层层动员。我们首先要求所涉及的各企事业单位领导和有关人员反复吃透文件，明确评聘目的、要求、原则和办法，切实把职称评聘看成是实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并认真、慎重地制订出具体的实施办法，逐项落实。

二、成立各级、各单位评聘工作机构。处以上单位均成立了职改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由各单位负责同志亲自抓并抽调专业人员具体负责。全市经济系列职称评聘则由市贸易发展局负责统筹，成立统一的经济系列职称改革、评聘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专门工作机构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广泛摸底的工作，经过摸底、疏理、排队，确定受评聘人员的范围，并初步建立所有申报人员的专业技术档案。

三、把培训工作和评聘工作结合起来，先培训，后评聘。考虑到队伍状况复杂，大多数50~70年代从学校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虽实践经验

丰富，但理论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我们先后在各企事业单位举办了10期各类培训班，参加人数达3065人。培训班立足于经济类专业理论基础和知识的更新，经培训，成绩合格率达85%，使申报评聘的人员素质有明显的提高，仅从提交的850篇论文来看，其中98%以上达到了职称评聘的要求。英语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511人参加的英语培训中，412人及格，占80.6%。

由于抓好了上述几项工作，我市经济系列职称评聘工作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尽管工作量大，情况复杂，新问题较多，但人员思想较稳定，认识较为一致，申报的热情高，所准备的各类申报资料也较充实齐备，真正使评聘工作与队伍建设、人员积极性的调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二）大胆探索、大胆试验，扎实、认真、细致地做好评审工作

在评审工作过程中，我们坚持“吃透两头”，一头是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and 规定条件，严格按中央、省所提出的标准，逐个审核、宁缺勿滥，确保每个高、中、初级职称受评聘者都符合条件；一头是本市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际情况，通过摸底、调查、培训，普遍提高，并逐个按实际能力与学识水平排队衡量，力求做到唯才是举，使评审工作按国家标准反映出特区的人才实力水平。

我们认为，职称评聘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评定职称，确认广大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和水平，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积极性；同时，也使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工作管理实现职位的科学分类化和管理的正规化。因此，职称评聘应该坚持几条原则，一是要标准化、系列化，二是要严格掌握，三是要与人事管理改革配套进行，实行定位、定员、定标准，使专业技术岗位真正实现人员专业化。这样的工作对于从未评聘过职称的深圳来说，难度是相当大的。尤其是，深圳特区不少企事业单位已引进了国外的管理经验和办法，同内地在管理体制上有许多不同，因此，既要参照内地经验，又不可能完全照搬内地经验。在市职改办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试验。

一、在最大的范围内，动员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评聘。我们组织了强大的中级职称评委班子，聘请了著名教授和富有经济管理实践的专家及主要行政领导干部共13人组成三结合的

评审机构，各级企事业单位也相应成立了初级职称评委班子。在整个经济师系列评聘过程中，我们先后审核推荐了高级职称人员40人，审核评定中级人员476名，先后请了数十名有关专家、教授参与了工作。积累、审核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情况资料数百万字，为掌握全市经济管理专业人员的基本情况打下了系统的档案资料基础。

二、坚持唯才是举与宁缺勿滥原则。我们认为，职称评聘要全面考核受聘人员的思想、业务和工作实践。但全面考核不等于没有重点，评聘职称不是审干，不是评先进和劳模，职称评聘考核的主要标准是专业技术知识水平和专业技术实践能力。因此，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一定要突出唯才是举的思想。专业技术职称评聘虽然与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紧密相联，但也不同于评工资或分蛋糕，因此，一定要克服平均主义。有些职位一时确无可胜任的人，则宁缺勿滥，决不降低水平，让评聘工作失去严肃性与科学性。在这两个原则指导下，我们处理好了五个问题：

一、处理好学历与工作实践的关系，既注重学历，又不唯学历论。在注重学历的基础上，重视考核工作实践经验和实际专业水平，并实行了三比较：比工作专业繁简，比业务能力的大小和贡献实绩，比专业的经验积累。对论文的评审，既要求理论达到一定的高度，同时也注重论文中所反映出来的实践经验。

二、将各项标准按实际工作岗位具体化，增强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使各类业务工作都有可以具体衡量的尺度，防止了因标准空泛而评聘无标准可依的弊端。

三、合理掌握指标，统筹兼顾。根据各单位和各类岗位的实际状况，确定下达职称的指标，对于那些专业性较强、专业技术队伍较雄厚的部门，给予适当的调剂指标，力求避免有些达到评聘标准的人因指标下达不合理而失去评聘机会。

四、几上几下，发扬民主，增加评聘工作的透明度，做到在专业技术水平面前人人平等，杜绝不正之风。

五、注意发现和提举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不搞论资排辈，尽可能使那些既有学历、理论知识基础较好，又有一定工作经验并已在各自的专业技术岗位上担当主角的中青年能评上相应的职称，使他们在第一线上发挥更大作用。

（三）可喜开端，收效良好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和实践，1989年初，我们基本完成了深圳市首次经济系列职称改革评聘工作，经省、市两级验收，达到了各项要求标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一、这次职称评聘充分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经济战线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这次评聘中，全市共评出高级经济师29人，经济师476人，助理经济师千余人。总的来说，受评聘面较广，标准的掌握也较准确。这对于各级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激发和调动，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受聘的人员中，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受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工作了二三十年才评上职称，他们的感受尤其深。许多人说，评定了职称，说明自己的才学得到了社会的正式承认，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据验收了解，绝大多数人对这次评聘工作感到满意。多数单位反映，评聘职称之后，专业技术人员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积极性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责任感和事业心也大大增强，这批受聘人员目前已成为各单位生产和管理的主要骨干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单位工作的开展。

二、这次职称改革评聘，促进了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圳市虽然是我国开放改革的窗口，但由于尚处于起步时期，不少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仍沿袭了一元化的行政领导包揽经营管理的单一体制，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仍主要是参照行政人员相同或相近的管理体制和方法。经济系列职称评聘之后，企事业单位才正式有了专门的管理专业技术队伍，一些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岗位，开始由专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充当了主角或负责人，使企事业单位行政工作岗位与专业技术工作岗位不仅在职能上适当分开，而且在人员的责权上也明确作了区分，加强了岗位责任

制，这就使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开始走上了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也在这次受到评聘，这就进一步改变了各单位领导班子的职称结构，加快了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知识化、专业化进程。以市贸发局所属公司为例，公司正副经理和总经济师、总会计师中，有中级以上职称者的比例占20%。企事业单位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更加浓厚了。

三、进一步促进了人人向上、奋发好学的风气的形成。这次职称评聘中，使越来越多的职工、干部看到了专业知识、业务技术的价值，因此，不论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或是没有大学学历的人，都进一步感受到竞争、奋发的紧迫感，一个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知识技术水平的风气在各单位普遍形成。不少人纷纷参加业余的各种专业技术培训，连一些研究生毕业，已评上中级职称的人，也自己掏钱，参加各类专业课程的学习，以求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适应新的形势，并为将来评定高级职称而努力。有些人还参加了外国的一些专业课程的学习。

四、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为今后职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在验收过程中，对这次职称改革评聘的全过程，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做法，从成绩到存在问题，都作了认真总结。例如，如何使今后职称评聘工作逐步转入正常化、规范化；如何使已评上的人员得到进一步提高；如何解决一些因指标或其他客观条件限制而未评上者的思想和业务再学习问题；如何合理兑现职称评聘后的相应待遇问题；如何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问题等，都总结出了一定的经验教训，我们相信，这些经验教训都可以为将来的职称评聘提供丰富的启示。

作者单位：深圳市经济发展局
责任编辑：陶原珂

科学进步的社会环境特征

吴素香

科学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和智慧结晶，作为人类一种相对独立的纯智力活动，有自身的内部动力机制，不论在哪个国度，都是相似的。而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历史阶段、时期，其状况是不同的。这就使得不同的国家科学发展的性质、水平和状况也有所不同。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可分为良性环境和劣性环境。良性环境就是指适合科学发展规律的要求，对科学发展具有正向作用的环境；劣性环境则相反。

科学进步的良性环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征：

第一，科学时尚的环境。

培根说过，如果一个事物（科学）不受到看重，它的不繁荣就是毫不奇怪的了。①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认为，科学与科学家本身的存在预先假定了他们在社会价值标尺上占有某种正（值）的等级，而这一价值标尺便是赋予各种科学探索以声望的最终仲裁人。②大凡科学发达的国家，都给予科学极重要的席位，造成崇尚知识、尊重科学的社会风尚。17世纪（特别是下半叶）英国科学突飞猛进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作为世界科技中心的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对科学表现出非常的重视和极大的兴趣，皇家学会成了国王的嗜好物之一，科研活动是达官显贵的“时髦行为”。查理二世本人对化学和航海颇感兴趣，鲁伯特王子称赞自然哲学事业并躬亲这类活动，子修·黑尔爵士和鲁帕·基尔福侯爵专注于流体力学的一些问题。当时，人们几乎都认为：一个“有文化的绅士”忽视科学的魅力是近乎反常的事情。③当然，这些显贵名流对科学的实际贡献是微乎其微的。但对于刚刚走出中世纪的黑夜、刚刚从神学的侍女地位中解放出来的自

然科学，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了科学在该社会正逐渐上升的地位。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对某行业的兴趣和重视程度，对整个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职业选择等行为会产生连锁性的强大的感染力。当时在英国，大批的牧师、商人、医生把探索自然奥秘作为时髦的爱好，成千上万的青年踊跃到欧洲大陆留学，尊重知识、重视实验的精神受到嘉奖。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牛顿这样的巨人，使世界科技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了伦敦。

我并不认为，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仅仅是一种时尚行为。如果这样，就把科学创造劳动简单化、庸俗化了，把科学家追求真理，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探索与献身精神抹杀了。但是，任何人的行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周围环境和社会时尚的影响，科学活动一旦成为“时尚行为”，对于科学家坚定探索信心，提高科研热情，无疑是有极大影响的，对于大批青年优秀分子在选择职业时选择科学事业，吸引一大批社会精英投身科学事业也起着很大的诱导作用。同时，这种时尚影响到社会各阶层，促使他们在物质上赞助科学事业，支持科学事业。因此，切不可低估了“时尚”对科学的作用。要使科学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处于被崇尚的地位，很重要的诱导机制是让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待遇高于一般人。只有当从事科学事业的人得到较好的吸引人的物质生活和工作的待遇时，科学研究才能成为人们所羡慕的职业，才能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曾经给科学家以高薪待遇，为科学家提供优厚的科研条件，都吸引了大批人才，促使科学突飞猛进。

第二，竞争与宽容的环境。

西方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史应当是一部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历史。^④科学竞争是科学家们在平等的外在条件下，充分发挥和表现自己理论内在的优势，争取得到社会确认的过程。科学哲学认为，科学思想有两个基本方面：发现领域和判别领域。前者指创造和发现新理论；后者则指不同理论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是在相互竞争中产生、成长、进步、退化以及被取代的。任何一个理论一经提出，常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是它被反常的海洋包围；二是它的内部矛盾性。而经过辩说、争论、评述，便可发现自身弱点、揭露缺陷和困难，促进人们进一步去研究，从而克服片面性、矛盾性，使理论更加全面、完善。科学是永无止境、能够自我矫正的事业。许多特定的理论同时并存，相互竞争，最后不断由进步的理论取代退化的理论，这就是科学发展的历史。

竞争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而科学竞争能否开展，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宽容度。

宽容就是允许科学家发表任何学术观点，甚至是与传统理论对立的、不太成熟的新思想；允许科学家采用多种途径获得成果和用不同于常规的办法解决问题。只有最大限度地对学术实行宽容，才有所谓竞争。人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从浅入深，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复杂的漫长的过程，在到达真理的漫长过程中，不同学术观点、理论的争论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十分正常的。一个新的理论产生，需要有较长的过程得到验证，确定其是否真理；一个新的理论，要否定旧的理论，也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较量，才能达到；一个新理论一开始或许是不全面的，但经过反复的讨论、实验，才可能不断得到补充、完善。因此对于新的理论尤其应该宽容。只有在宽容的环境中，科研活动的主体才能获得“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这对于创造力的发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必然允许每个公民的创造活动的充分自由，并承认创造活动是对社会有益的，并且，在法律和政策中对自由的科学活动加以保护和鼓励。这样，人们的顾虑可以大大减少，意识定向将会大大增加，创造和探索的信心大大增强。

当然，任何科学家，其思想都会受到一定哲学观点的支配，也有个为谁造福的问题。在我们

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工作者应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活动，应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竭尽全力。

第三，合作与交往的环境。

科学合作的环境是指科学家之间、师徒之间、科学界与社会其他各界之间互通声气、取长补短，齐心协力，共同攻克科学难关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是科学加速发展的催化酶。

科学是一种公有的知识，是一种协调的活动，科学的发展愈来愈说明：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总是有限的，而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是科学发展的最大力量。现代科学朝着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发展，其研究对象越来越复杂，研究仪器、设备越来越精密，它要求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也就越来越高。因而，它的成果较多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有不少实例说明，随着时间推移，科学领域合作研究的发生率成正比增加，在诺贝尔奖金开设以后最初25年中，获奖者的工作中有41%是合作性的，到了1972年，79%的获奖者由于合作而得奖。目前，在科学发达国家，国际合作的科研项目正逐年增加。

科学合作的潜在形式是交往。科学家的人际交往和学术交流是科学信息传播、沟通的社会过程，也是一种披露科学观点、交换科学信息、思想、增进相互了解，发展学术关系，争取取长补短的社会互动过程。这些交往或以有组织的各种活动实现；或者以科学书籍、期刊、通信等的文字形式交流；还有以非自觉的人际接触达到交流。在这种学术交流活动中，科学家们的大多数才智更为敏锐，思维更为活跃，许多新思想的火花往往一瞬间因碰撞而迸发。正因为如此，贝尔纳认为：“在人们所有事业中，科学最依靠互助和谅解。”^⑤默顿认为，摆脱传统主义并甘愿接受新事物是与接触的速率、数量和强度密切相关的。^⑥在交往与合作之中，科学思想的接触、了解与交流是合作的前提，合作的环境必须是这种接触、了解与交流便利的环境。要开创这样的环境，需要科学工作人员的真诚努力；需要社会交通运输、通讯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积极兴办各种科学期刊、书籍出版的事业；需要热情鼓励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社会必须为不同部门、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方便与资助。

- ①②③⑥ 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科学、
技术与社会》第116、340、37、337页。
④ I·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 ⑤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718页。

作者单位：中山医科大学社科部
责任编辑：范英

重 要 启 事

长期以来，本刊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作者的大力支持，来稿日益增多。鉴于本刊经费不足，邮资提高，参照其他刊物作法，今后作者来稿务请自留底稿，本刊不再退稿（包括铅印、油印、复写、手抄稿等），请予合作。

凡从本刊收到来稿之日起，三个月内作者未收到采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

作者来稿，请勿寄给个人，以免发生丢失。

从“时间递进”到“空间传动”

——近代化历史的动力学思考

乐 正

我们已习惯把历史放进时间的维度中去加以考察，即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的思路去看待历史现象。无疑，这是对历史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思维向度。但是，当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基因进行宏观思索，特别是对社会的近代化问题做一整体反思的时候，便会感到，历史运动的向度并不是单一的。有时，时间的积累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做纵向的线型运动；而有时空间的沟通与扩展也能形成一种历史力量，使社会在横向传动中发展前进。因此，仅从时间维度来认识历史进展的动因显然是很不够的，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不同的向度去展现社会历史的运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可以大致地划分出两类运动形态：时间递进型的历史运动和空间传动型的历史运动。前者是古代农业社会发展的一般特征，后者则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时间递进”到“空间传动”的演变，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基因已有了重大改变，它从社会动力学角度为我们认识近代化运动的一般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几乎都过着一

种相对独立而大体一致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同质性就是它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逻辑和与此相适应的社会闭塞状态。这种经济模式既是人类开发能力低下的产物，也是造成这种低下能力的基本原因。因为它使古代人的生活期望值滞留在最低的水平，生产劳作只是满足于对基本生活的一种简单维持和再生，除此之外，社会不允许其成员有其它的“非分之想”。赢利的观念在社会成员中是极淡薄的，或者说是被禁止的。有限的商业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存在主要是为王室贵族和地主富豪提供服务，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相涉无多。即使有贸易交流，绝大部分也是初级产品的交换，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量是进行这种贸易交流的重要前提之一。实际上，人们的交换欲望和交往资源往往是成反比的，即那些国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反而因其能自给自足而缺乏交换的强烈欲望。相反，那些以经商贩运著称的阿拉伯人、威尼斯人、尼德兰人因所处的地理优势，虽有极强的通商欲望，但自身却没有什么交换资源。因此，古代的商业贸易通常不是控制在生产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手中，它不可能作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力

量去改变小农经济结构，有限的空间流动也不能成为一股历史的动力，去推动社会进行根本变革。从宏观上看，它只是做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和调剂手段，促进某些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它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由于古代各个社会系统间缺乏广泛、经常的联系，空间流动不可能构成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基因，因此，时间的递进与历史的发展融为一体，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一种时间递进型的历史运动。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和特征：1. 各个社会系统受制于农业经济结构，呈现出很大的独立性、封闭性。社会的发展动力是内在的、自生的、以时间为向导的；2. 各个社会系统在独立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自律体系，社会发展的地区性、民族性因素被强化与发挥。所以，在古代社会大至国家民族，小至自然村寨，人们都是依照自己历史经验的提示与文化传统的惯性来开拓社会的发展道路。人们习惯于前因后果的思维逻辑，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处处显现出很大的世袭性、既定性、承传性的痕迹。正因为如此，古代人缺乏世界的整体空间概念，世界也不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而是许多缺乏功能联系的“小天下”的机械相加。空间的流动不可能具有历史动力的意义。

时间递进型历史运动创造了一个因袭性很大的社会机制，它引导人们以各自的传统遗存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培养人们历时性自我比较的思维习惯，因而在客观上抑制了人们的开拓精神和创造性思维，增加了社会发展的自然惰性色彩。由于缺乏刺激手段，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缓慢

的。据有人估计，从公元一世纪到1850年，世界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1%，世界人均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0.09%。（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第2页）人们只有以世纪为单位才能看出古代社会经济的某些局部变化。

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运动使人类发展的动力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种我们称之为空间传动型的历史运动随着商船、大炮和机器在世界各地的轰鸣声出现了。它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在地理空间横向展开的历史力量，人类在这种传动中创造出空前广泛的空间联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出现，人类从此步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体化的时代。

新的历史运动的发生是人们逐渐从中世纪的思想禁锢和对土地的依恋中解脱出来的结果。在16、17世纪的西欧，乡村手工工场主、商业冒险家和思想大师们都在积极创造着一种新的社会气氛：“人生的目的不是要去战斗、去祈祷、去沉思、去创造、去享乐，或者去变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去图利。如果他是主人，就得为自己图利，如果他是仆人，就得为别人去图利，这就是人的职责，而社会的职责就是不去加以阻挡。”（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第207页）这种以追求超额利润为时尚的社会心态，使西欧社会出现了大的转型，人们的兴趣从土地转向了市场，从农业转向了通商贸易与出口加工。为赢利而去经商，为扩大贸易而发展商品生产，为了生产利润去寻找和占有廉价的原料及劳动力市场，这样人们离开土地，走出家园，继而走出欧洲，走向世界。他们采取殖民掠夺的手段，把世界各地的财富迅速集

中到自己手中。

必须指出的是，重商主义与殖民战争的结合，造成一种无法抗拒的空间力量，促使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也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用资本主义的逻辑力量运转起来的“空间传动系统”中去。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186页）“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同上第188页）

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的启动始于西欧的商业革命时代，而它成为时代的主导动力则是18、19世纪欧美工业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浪潮把人类历史推到了新时代的临界点。因为它使因“抢劫性质的商业”而造成的东西方之间的贫富差异，演化成因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各社会系统的发展时代差有了重大的改变。至此，近代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的两大特征——世界一体化趋势和新的社会发展势差结构——都在质的方面被确定下来了。这种世界一体化势差结构的“空间传动”作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动力，推动着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进程。

总的说，空间的扩张既是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产物，也是它的基本动力。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都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各国都与外界空间有日益广泛和经常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转化为推动各自社会系统发展的动力基因。造成一种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的模式。从这一历史运动的发生、发展看，其

基本要素是：1. 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逻辑；2. 国际市场体系的建立；3. 近代工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4. 殖民主义军事扩张机器的强化。其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空间化、国际化，与外界空间的沟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值得探求的是，“空间传动”为何能成为一种历史动力？它又是怎样改变世界的面貌的呢？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也许能作出解释：

第一，它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追求，驱使人们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投入，因而刺激了人类在经济领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正是追求更大的利润、更多的占有的观念，使人们急于从中世纪的城堡中走出来，拥抱了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确立了新的人生观。要占有就必须去寻找经济机会，开发经济空间。正是那些最先走出农庄和家园，大胆从事空间开发和商品流通的冒险家，成了第一批近代公民——资产者。同样的道理，在最先重视商品经济功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西欧”哺育出了第一批近代国家。几乎所有的近代工业国家都从经济空间的开发和通商贸易中捞足了好处。这种现象无疑形成一种动力，鼓励更多的人去走这条道路。于是，人们都纷纷挤身于经济开发的行列，人类的开拓精神、实干精神和创造能力、想象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正是这种开发的欲望与智能的发挥，使社会大踏步地前进了。

第二，它促进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近代化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对经济的开发往往首先从流通领域开始，

然后转向工业、交通领域。“努力出口”是努力生产和技术革命的诱因。而产业革命则是商业革命的必然结果。从1800年至1913年，世界人均生产每10年增长率为7.3%，而世界人均贸易额每10年增长率为33%。1913年世界人均贸易额比1800年增加24倍以上，而同期世界人均生产只增加2.2倍，（《国际贸易概论》第384页）并且，在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初级产品贸易的增长是主要因素。即使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1876—1913年间，世界贸易的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仍在62.3~64.3%之间波动。（同上第387页）这说明空间传动的扩大先于工业革命浪潮，它对各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的刺激作用是巨大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殖民地产生世界贸易，世界贸易就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402页）“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

第三，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刺激社会经济增长的手段。近代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它使各个国家地区都相会在国际市场上，彼此沟通与交换，既合作又竞争。但这种商品经济所承认的原则是参与机会均等与分配份额的不平等。因此，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接受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考验。提高生产能力，增强本国的商品输出能力，以便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已成为国家民族富强的基本条件。掌握竞争规律，提高竞争能力已成为近代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这种竞争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恰好提供了刺激社会经济增长

的手段。空间传动——→市场竞争——→革新创造——→经济发展，这样一种动力促进系统使近代社会经济增长率空前提高，社会发展的节奏大大加快。

第四，它使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多元化、国际化。如果说时间递进型历史运动的动力基因是内在自生的比较单一的话，那么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把大部分国家都卷入到国际生活的漩涡中，社会越来越受到一种强大的外来力量的推动和影响，使各个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越来越多元化、国际化。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和人们视野的扩大，人类文明成果也日趋国际化，国际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已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国家的近代化都从对外来经验、模式的学习引进中获益不少，拿来主义已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手段，而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为国际间的相互学习和引进提供了可能，它也正是在促进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交流中显示其优越性的。近代以来，各国的社会发展不仅受制于先因后果这个古老的发展逻辑，而且受制于外因内果，内因外果的新的逻辑。社会动力的多元化削弱了社会发展的传统色彩，而强化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时代意义。

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改变了历史的陈旧意义。历史不仅是一张社会进化的时间表，而且也是一张可以清晰地标出社会发展“等高线”的地理空间图。从原始部落到最先进的工业社会，人类所经历过的各个发展阶段都以空间的形式分布在一张世界地图中。由于这种“历史的空间”印象的形成，人们渐渐地习惯于把地理空间的概念与社会发展的差异联系起来思考问题。

“西方”、“东方”、“欧洲”、“非洲”，当这些地域名词被人引用时，往往已经加进了历史的、社会的内涵。这种把历史的意义赋予空间的思维习惯，正是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的产物。

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改变了世界的意义和各个社会系统自身的意义。随着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形成，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存在着日益加深的相关性、依赖性和互补性，人们对空间环境的敏感越来越强。一个国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自身的发展，而且在于它在国际事务中所产生的影响。相反，国际社会的作用力也成为某一国家进行内部变革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这种外部横向作用力的存在，使近代各个社会系统的发展越来越国际化了。

当然，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时间递进型历史运动的完全消失。因为在任何情形下，时间和自身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意义都会存在。近代化运动并不是这两个社会动力基因的更替，而是两者进行不同的整合之后，其主导作用的位置改变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历史中，这两者的整合过程及其结果在东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近代西方，由于社会自觉地完成了内部结构的根本变革，由自然经济结构转为商品经济结构，因此，社会的封闭性已不复存在，其独立性也转变为开放中的独立性。通过两种动力基因的调节整合，使两者保持着方向的一致性和作用的协调性，从而加速了近代化的步伐，走在时代的前列。而在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由于内部和外部多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完成社会自身结构的根本变革，自然经济成分仍大量存在，社会的封闭性仍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影响着它的近代化进程。于是，时间递进型历史运动的主导作用虽大为削弱，逐渐让位于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但它与后者一样对社会生产仍起着巨大的作用，从而把社会导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两种社会动力基因的不协调和矛盾冲突，阻凝了社会的近代化历程。由于东西方国家两种社会动力基因的整合过程千差万别，因而也造成了世界近代化运动的另一个基本特征：目标的一致性与结果的差异性。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所造成的世界一体化趋势是建立在各社会系统间发展的势差结构基础之上的。空间传动所创造的不是一个理想的国际对等交流体系，而是一个不平等的多层次的梯型势差结构。这种“社会势差”结构后来被以“三个世界”的划分加以认定。除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明显的社会势差外，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间也有明显的社会发展势差结构。在近代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长江流域与西部边陲地区之间就存在较大的社会势差。近代世界一体化势差结构的形成，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这种“势差”是西方列强进行空间扩张时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因此，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发明的一种残酷的非理性的社会进步方式，而历史的悲剧更在于，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残酷竟成了近代以来鞭策人们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时间递进”到“空间传动”，近代社

会动力结构的演变趋势提示我们，在考察社会的近代化运动时，抓住“空间传动”这个动力基因是非常关键的，它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各种事物中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各国近

代化的历史都看成一种“空间传动”的历史，一种世界一体化的演进历史。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鲜规” 权 义

黔 容

本刊1989年，第1期“鲜规”考一文，为《庄子·天运》“鲜规之兽”一语做了解释，反复论证，读后颇受启发。仔细思考，觉得义仍未安。首先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这句话到底是针对什么说的？为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把原文抄上几句。《天运》的作者在借老聃之口论评三皇之智，以为“其知僭于蜎蝨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考》的作者释义说：三皇之智“其为毒甚于蜎蝨之尾，是故细小虫兽，皆遭扰伤，不得安其性命。况于黔首，如何得安。”照此说法，则“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便不是说三皇之智，而是另外的一回事；“莫得安其性命之情”便也成为“鲜规之兽”的境遇——不能保其生命。可是，这“性命之情”，在《庄子》中并不罕见，决非只见于此篇，如“不失其性命之情”，“决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则性命之情病矣”（《徐无鬼》）等都是。这就提示给我们，“性命之情”在《庄子》中乃是一个专用词，有着独特的意义。且举一例，如《在宥》“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就是说，“安其性命之情”，只有通过无为，才能达到。这是自然的本真，这样高的境界，只能求之于有道之人，决非细小虫兽所能达成的，因而把它系于细小虫兽，就不对了。实际它说的是三皇之知。“鲜规之兽”并不是细小虫兽的意思，它和“蜎蝨之尾”是并列的句子，由“僭于”把它们连结起来。“鲜规”二字，也都是习常的涵义。“鲜”同“眇”，意为少。“规”，《说文》“有法度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指出，“言有规矩也”，引申可说成为约束。那末，“鲜规之兽”便是没有约束的兽，也就是野兽，野兽是会吃人的。“僭”通“惨”。所引一段话的意思应该是，三皇之智，比蝎类的毒尾，凶暴的野兽还要残忍，不能够保持自然的本真，还自以为圣人，难道不可耻吗？这样的解释，不知以为如何？

论鸦片战争时期

中国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反应

孙 谦

19世纪中叶，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忿激、惶恐、冷漠、压抑、升华的情绪时涨时落，刑威德柔的呼声时起时伏，用夏变夷与师夷长技的主张同时并存。然而，无论哪位精明干练的大员，都会因交涉乖张而获罪，不管哪种应战方式都会因无经验、无基础而失利。因此，怎样评估中国人的反应，追寻这些应战方式失利的原因则是本文的任务。

刑威德柔

主体对于客体挑战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原始的自然愤怒的抗击，这在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周边民族为蛮夷的中国人那里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就有人提出应付英国鸦片走私和武装骚扰的原则：“夷人性情，本难恩感，当以威治。我示之弱则彼强，我示之强则彼弱；我畏其生事则彼益好事，我不畏其生事则彼且帖然无事。”^① 鸦片战争初期也有人满有把握地阐述制“逆”之法：“逆夷最畏我朝刑法，……传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此万古不易之法也。”^② 前后数年，这种“威治”、“刑治”的示强原则贯穿于各种各样的上谕、奏

折、信函、告示之中，朝野上下普遍认同。具体对策便相应而生：

以商制夷。以停止贸易惩罚外商的办法，在鸦片战争前就曾施行过，鸦片战争期间，更得到了强化。曾望颜反复强调：“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③ 其他开明如林则徐等人也持有同样观点：“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需要，何难闭关绝市？”^④ 这些看法汇总到道光帝那里，则成了一道“即将英吉利贸易停止”的诏令，闭关遂成既定国策。

闭关当否？从民族自卫的角度和用兵的非常时期看，似无可非议，然若论其绩效，则大可疑。这里有两则材料可资说明：一则是黄爵滋著名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他从英中正当贸易与鸦片走私的比额入手，认为正当贸易之利不敌鸦片走私的1/10，英人之意在后者不在前者，即使“禁之通商”，也不会“拔其贻害之本。”^⑤ 另一则是《澳门新闻纸》的评论。它从西方航海技术的发展与中外贸易的扩大入手，认为“二百年以来，西边各国行船之法，勇

敢之心及国中财帛，俱已大增加。……故所有之人，无不望复得此（按：贸易）利益。”而“中国之人，尽皆爱做贸易，虽有违禁，尽心设法以避法律之严”，“中国若一停止正经合法贸易，……必拖累其本国受不测之祸。”^⑧ 两则材料中，前者把正当贸易商与鸦片走私犯视作一体，因而忽略了正当贸易的潜在力量，后者则强调了正当贸易的冲击力，而有意无意地避开了鸦片走私的破坏力；但是两者都清楚地说明了闭关绩效的有限性和持久闭关的不可能性。事实上，清政府的闭关并没有平夷性情，更没有制伏其命，相反，西方殖民者的挑衅更加激烈，鸦片、贸易、战争齐头并进，中国以商制夷、闭关限夷的办法没有成功。

以民制夷。当民族冲突日益尖锐并爆发为战争的时候，“民为邦本”、“民心可用”的先圣训戒又在部分比较清醒的官员的耳边响起。于是，在各种各样的守御策中，便出现了“团练民勇，以壮军威”的字样，林则徐、邓廷楨等开明人士则在广东、福建招募渔户、沙户、蛋户以助战守。然而，即使在“以民制夷”的思想占上风的时候，封建统治集团内仍有暗流。有人把以民制夷看作是以贼杀贼、以毒攻毒，这样必有后患，还有人心存“民甚于寇”的余悸，始终视民为祸根，惟有控驭而后快。因此，当一直执行“防民甚于防寇”方针的琦善取代林则徐时，水勇便被遣散了，防御设施也被拆除了，当三元里乡民包围英兵时，余葆纯甚至干出了助纣为虐、放虎归山的勾当。在这种背景下，重民思想无法在各地落实，也无法长期落实。民欲抗夷而不能，以民制夷也只能不了了之。

以夷制夷。这是中国行之久远而又屡试不爽的外交策略，兵法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势也。”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的心目中，西人与古时周边的狄夷一样都是性情狡诈不曾开化的夷人，控驭之方自然也是分也、间也。林则徐认为“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⑨ 包世臣则形象地把以夷攻夷之策喻之为“羊吃麦叫猪去赶”，也认为以夷攻夷必要且可行。^⑩ 这一对策是否可行？否。林则徐等虽将正当贸易与鸦片走私分别处置，将顺逆不同的国家区别对待，有利于中国掌握外交、军事主动权，但是，他们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所以，他们的主张与其说是集众强以踏鹿，毋宁说是一种幻想。这种情况，当时就有人作过分析：“（英法美）三国外若水火，内实狼狈，在西洋则不无蛮触之争，在中国则隐有辅车之势，必不肯戕同类以媚天朝。”^⑪ 后来法美等国乘火打劫的事实就是证明。

德柔远人。直接的攻击都失败了，中国只能由战转为守，继而，守亦不果，言和乃成。之所以作出和的反应，一方面固然与部分中枢人物畏惧于外来挑战的压力有关，琦善总害怕“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本年即经击退，明年仍可复来”，处处决胜、时时决胜实不可能。^⑫ 道光也承认，“驭远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愈出愈奇，……故一切隐忍待之。”^⑬ 这种情况，外人的评论一语中的：“想因承平日久，刚气已退，自知不善战，故每事只用柔治。”^⑭ 另一方面，和局的形成与中国人用夏变夷、

心德攻心的心理也有关系。中国的取远之法，自古就是威德并用，相辅相成，所谓“使畏且怀，制夷之道也。”如果威足使之畏，德足使之怀，自然善莫矣；如果威不足使之畏，以德使之怀仍不失为有效的“手筋”。中国历史上败于外族的战争不少，可到头来，外族反被中国同化了。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人也有此“自信”。如中英签约不久，广东商人就开始了攻心战术。《广东夷务事宜》所载“告谕英商大略”10款中，竟有5款与德有关，冀借礼义望其不要无端生事。^⑭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期到处出现于书信、告示、奏章、上谕、条约上的俯顺、怀柔、羁縻、笼络等字眼，除了掩饰失败的恐惧之外，似乎也蕴含着以德攻心、决战于“文”的“自信”，当然，这种“自信”只是昧于世界大势的“盲信”，这种精神防线只是以威示强的回光返照而已，尤其是败而成盟以后，这种德柔远方的言谈反倒给人以几分滑稽之感。

是祸，是福？

战争在人们心头留下了阴影。殉道的、文恬武嬉的、知不足而退的、无所适从的，应有尽有。不过，在这一阴影中，隐隐地也出现了一道否极泰来的闪光。

殉道、不仕如王鼎、臧纟青者有之，在他们心里，和夷是一种耻辱，华夷杂处万万不可。王鼎因谏诛琦善不成、绝望自缢后，其“棺前所布灰砂，画一人字甚大，又于前后左右画无数人字，又极小。”^⑮此中寓意，正是传统文化褒贬之所在。以身殉道，正是中国文化之精神。

文恬武嬉者复有之。“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恋雷之意。海疆之

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伊有诗书偶语之禁。”^⑯

知不足而退者也有之。战后，许多志士仁人参与意识急剧减退，转移视线以求超脱的心理十分突出。姚莹以有功之臣获罪后，就是这样想的：“智常无碍须弥小，心自能亨蜀道平”，^⑰“倚道林、邓二公，相聚西域，亦不寂寞；或可乘暇读书，补身心未了之事，岂不美哉！”^⑱

无所适从者更有之。陈寿祺是其代表，他在一份上书中道出了这种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心境：“闻夷人互市，驾驭颇难。西洋此辈，桀骜狡黠，常有轻易中国之心，……抚之不可失怀柔，然也不可失威重也。”“内外阻窒，思之实无良策。愿未知苍苍者之悔祸何日也？”^⑲

今古奇变。其实，左右为难者并不止陈寿祺一个。不少人在为难中都隐隐感到了书契以来所未有的奇变：“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之逆夷所困，……令人发指皆裂，泣下沾衣。……逆夷叵测，事无了期；”^⑳“其他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㉑“天主教……挟兵威以鼓其邪说，假邪说以偿其大欲，土崩瓦解，旋至立效，恐自古谋人围下人城者，无此速且易也，然此必至之势也。”^㉒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生活表层的冲击已让中国人难以消受，更何况信念根基的撼动。

否而之泰。挑战未必是坏事，挑战也许是迎头赶上的好机会。包世臣悟出了：“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的道理。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说得更明白：“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

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②鸦片战争就是这样从反面让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由寐之觉”、“由虚而实”的必要和必然。千年一觉酣睡梦，该醒了！

睁眼看世界。习惯于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人一下子感到老子天下并不第一，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创伤并没有消退，总得看看别人是怎么个强法。梅曾亮一方面一如以往地睥睨着西方，“区区一丑夷之情状，诚不足以设心”，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期望“解惑”，“吾将询于其来以解群惑，书以志之。”^③说起来，他的虚骄心理依然很突出，但由色厉而内荏的这一转变还是很有意义的，这里正隐含着由睥睨西方到正视西方的契机。在这方面，林则徐是开风气之先的。早在战前，他就在广东前线踏踏实实地做着知己知彼的工作，他派人翻译的《澳门月报》、组织编写的《四洲志》等，对于战期战后的中国人了解西方的现实和历史地理都起过重要的影响。战后，魏源、徐继畲、梁廷枏、萧令裕、夏燮等继续作着与林类似的努力，出版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夷氛闻记》、《英吉利记》、《中西纪事》等介绍域外史地的著作，改变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天下观念。

师夷长技以制夷。战争使中国人目睹了西方枪炮船舰的威力，也教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策。早在1841年，李福祥即捐买了洋枪洋炮，期在“借彼之矛，攻彼之盾”，“以逆夷之物，还逆夷之身”。^④同年，道光帝在给广东督抚的饬令中表达了造船、购船的想法。战后，魏源提出了更为具体、条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虽然，时人对夷技的认识还

很片面，但从鄙视夷人到承认夷人也有长处并且主张向其学习，这确实是中国思想界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育才兴邦。鸦片战争中夷务办理者的颀预，使得中国人不得不自我反思传统教育的得失。人们发现传统教育至少存在两大弊端：一在域外域内的学问上，重内轻外。“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⑤“纵有人知道一二（外国事），皆系卑微之人，又无官职加以鼓励，究系他们所知事情比别人较多，反又轻慢之，以为与夷人交易”。^⑥二、在文章和技术知识方面，重文轻技。张禧与英人马礼逊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马以机器之巧问张：“贵国之人，亦能此否？”张云：“此技虽巧，天朝之人，用心不在此。”马追问：“彼之用心何事？”张答：“我国用心在文章”。^⑦在这种背景下，当海舶猝来之时，便找不出应付自如的干济之人了，“晓畅兵机，才堪将帅，目中未见其选也。”^⑧人才脱节，识者忧虑，不少人相继呼吁，“夷务重要”，首在得人。得人之法，“似不宜守拘墟之见”，有人甚至认为“求人才于今日，实寻常选举科第中之所难，”^⑨言下之意，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标准突破原有框架而面对现实，实际即触及到了清朝封建教育、政治制度的神经末梢。

显然，经过战争的劫难，人们的心态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行为正在从务虚转向务实，而当外部的挑战转化成内部文明和人格的生长时，中国文化便出现了真正的生机。

睡狮尚未醒。中国真的会就此倾否之泰吗？不然。试从两方面言之：一，举国

皆浊儿人醒。鸦片战争以后，睁眼看世界的人实在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依然没把西洋人放在眼里，还有不少人则以为条约签订以后就长治久安了，甚至有些人竟然认为这场战争是天意之所在，听由命运的摆布吧。人们还在编织着五花八门的梦，仁人志士的呐喊很快被歌颂皇仁的海洋所淹没，卓识独具的著作也默默地忍受着虫咬鼠噬。二、睁眼者似醒非醒，未能看清世界的真正面目。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西方技艺的长处，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长技背后的制度、观念也有优于中国的地方；他们一方面承认西方的长技，可转头又说那些长技只不过是中国的余绪，仿佛学习西方的长技只是拣回中国失去的东西。也许这样做会减少西技传入中国的阻力，可也正因为这样模糊了对西方本质的认识，相反延缓了中国深入学习西方的步伐。

看来，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来说，真是祸福两依依。

魔 力 场

人们总喜欢按理想模塑未来，可历史却以它巨大的魔力常常让人们不是在“应该”而是“可能”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国悠久的历史铸定了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反应模式。

大地的“恩情”。中国的先民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这方古老的土地给了古老的中华民族两份“礼物”，一方面，强化了中华同胞眷土爱国之情。鸦片战争期间，“我虽乡愚小民，乃亦天朝赤子，惜身家亦惜土地，终怀父母之邦，保土地即保身家，愿作干城之寄”^⑧的心声充溢城乡。这也许是中国危而未亡的一个原因吧。另

方面，大陆环境也种下了闭目塞听的病根。古老中国筑万里长城对付游牧民族的侵扰，谁要是打开国门远征对手，则不免被士大夫讥以“侈情远务”，雄才大略如汉武帝也以此获咎。在这种氛围中，“虽有学士通识，亦第讲求塞下形势而已。”^⑨全然不知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差异，所以当近代面临海洋民族的挑战时，也是采取对付游牧民族或是部分倭寇的办法，封关禁海，把自己围起来。结果，虽是久历疆场的封疆大吏，一遇来自海上的西方人，也举措乖张了。

农业的“收获”。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重农抑商、贵义贱利、崇俭黜侈的价值观念始终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社会就是在这单一的节奏中维持着相对的稳定。一旦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稳定和谐便有被颠覆的可能。西方民族载着商品东来叩关，实际上是商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挑战。这种挑战自然是中国的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鸦片战争时期，吴嘉宾的心理很有代表性：“天下之贫患，皆由于粤省，凡挾赏赴粤者，所得厚利皆钟表、呢羽、洋货、洋烟之属，展转流市，而重赏则尽寄于粤而不得返。”“语云：‘蕴利生孽。’粤之祸非蕴利致然与？夫夷人本不足为吾患，而内之匪民，欲使其必为吾患，以逞其志，祸之所以成也。”在他看来，蕴利生孽，而且以为货物出国就是财富流失，所以他的应付危机的办法便是：“重抑海疆贸易，以正其源。”^⑩在这里，闭关政策的底蕴和目的跃然纸上，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的冲突昭然若揭。

传统的“赐予”。悠久的历史累积了深厚的传统，深厚的传统强化了思想定势。

人们在面临新的情况时总习惯性地依据已有的知识、按着一种固定的思路去思考问题、采取对策。这种传统的思维倾向，给鸦片战争时期的人们以双重影响。一方面，它驾轻就熟地斩断了五花八门的“乱麻”，使人们更迅速、更有效地找到了现实难题的答案。民为邦本的古训使部分爱国的中国人大胆用民而不疑；变易与经世的哲理使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门师夷而不惧。另一方面，在清理“乱麻”中又斩断了中国人自己的手脚。首先，华夷观念的窒碍。在古代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周边少数民族，因而以声教文物之区自居，视其他民族为蛮夷戎狄。这就妨碍了中外民族的正常交往，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异势的情况下，危害更深。人们有脚不愿迈出去，有手不愿拿进来，不屑于外事益无知，不屑于夷长益落后。其次，刑威德柔的失当。刑威德柔是与华夷观念紧密联系的一个中国处理“夷务”的准则，如果说这一准则在古代因为有实力和文明作后盾、在实施时还有一定效力的话，那么到鸦片战争前后，当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衰退、政治高度集权、人民没有保障的时候，必然是刑威四夷，四夷不畏，德柔远方，远人不归。此外，中道西器的唯心认知使入了门的器施展不了威力，知足常乐的心理体认使人们在大难以后尚能歌舞升平，息事宁人的社会目标泯灭了人们的斗志，等等。处处说明传统遗产中有不少缺乏应付新局面的张力。

战争的“硝烟”。中西文化的这次大冲突是以战争形式相见的，战争的硝烟对中国人的决策影响至深。首先，加大了沟通

渠道的负荷，中外之间的照会、咨文、敕谕无法正常、及时地传递；沿海沿江的军事信息突然增多而歧义，此处报捷，彼此吃紧；这里厮杀，那里谈判。这些情况无疑是造成清朝最高决策者忽威忽柔，忽战忽和的一大原因。其次，战争的严重危机造成了决策的短期行为。战争使一切民族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都按军事原则来处理，导致了决策的盲目性和行为的急功近利。再次，文化之间的接触本来就存在排他性，而战争的创伤，则更弱化了人们对西学的认同，强化了人们对西方的偏见，所以，即使有识之士从理性上强迫自己适应西方，他们的感情也自始至终通不过，西学只能在理性与感情的夹缝中一点一滴的挤进来。

总之，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所面临的西方挑战是严峻的，这是一次海洋民族对大陆民族的挑战，商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挑战，新兴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对古老的封建帝国的挑战。这场挑战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播圣经传科技相比，其强度不可谓不足；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相比，其强度也不可谓过分。如果暂时撇开鸦片战争的非正义的侵略性质不谈，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挑战也许正处在一个“最适度点”上，也即“在强度不足和强度过分之间的某一个地方”，而这种最适度点的挑战正足以对文明的生长“发挥最大刺激能力”，也是中华民族应战的最好机会。如果中国人及时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及时引入海洋民族的冒险精神，商业民族的竞争精神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制度和观念，中国未尝不可以很快振作起来。然而，历史毕竟不是

由“如果”写成的。按照行为科学理论，应战主体对于客体挑战的反应模式是受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制约的，同一客体的挑战对不同的主体必然产生不同的应战，客体对于主体的影响最终还取决于主体自身。鸦片战争时期，尽管社会的少数精英已经意识到今古巨变的来临，并且也不乏耻而后振的气魄，但是，历史的重负不仅束缚了这些精英的应变速度和幅度，而且少数精英的微弱呐喊也没有唤来社会多数的觉醒。近代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最终还是失败了。

(1)(5)(17)(18)(20)(21)(23)(25)(28)(29)(31)(32) 见《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第15、21、91、6、100、

95、19、100、90、98—99、101、5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⑬⑳ 见《鸦片战争》丛刊三，第23、355—357、319—320页。

③⑥⑫⑱⑳ 见《鸦片战争》二，第128、447—448、543、598、411—412页。

④ 《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四。

⑦ 《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一。

⑧⑪⑯⑳ 见《鸦片战争》六，第465、572、549、604页。

⑨⑭⑮⑳ 见《鸦片战争》五，第434、531、529、337页。

⑩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

⑫ 魏源：《海国图志》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从张九龄「阿党」雒议开元

间南北文化之碰撞

唐
森
林
立
平

自安史乱后，张九龄的历史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旧唐书·张仲方传》言张九龄是“开元朝名相”。《新唐书·忠义传》记德宗时史馆考录勋名特高的宰相功臣92人，分为三等，张九龄即列入第一等，并在大中初将其画像挂入凌烟阁。南宋洪迈品评汉唐名相，谓张九龄等“皆为一时名宰”。①明成化九年翰林院侍讲丘濬作《曲江集序》，指出张文献公不仅是岭南以及长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是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丘氏的评价与众不同，他注意到南、北文化在地理上的差异，认为“自三代以至于唐，人才之生，盛在江北。开元天宝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显者，而公首以通侔伊吕科进；未有以词翰显者，而公首掌制诰内供奉；未有以相业显者，而公首相玄宗”，②也就是说自张九龄之后南方人才辈出，他在南方人才兴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③此论是否确当，姑且勿论，但有一点无可置喙，即认识张九龄其人，不唯有助于了解开元政治、对于探索南方文化的特点乃至南北文化的冲突，都将有所裨益。

对集权制的封建帝王来说，大臣攀附结党是最令他感到不快的事。然而正是在帝王的眼皮下，一股股政治势力无时不在生成，瓦解，瓦解，生成，它并不以帝王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封建官僚体制所决定的。在这种体制下，任何人升迁，都必循他人引荐提拔，想保住乌纱帽也须有自己的势力圈。于是，官僚士大夫相互攀附交朋结党早已司空见惯。张九龄身为封建官僚，尽管任左拾遗时曾上书言变革选部之法，以防“阿私”、“朋党”，但他本人的仕宦生涯同样带有“阿党”的影子。如《新唐书·宇文融传》记载：

中书令张说素恶融，……张九龄谓说曰：“融新用事，辩给多诈，公不可以忽。”说曰：“狗鼠何能为！”……融怒，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等廷劾说引术士解祷及受赇，说由是罢宰相。融畏说且复用，誉诋不已。帝疾其党，诏说致仕，放隐甫于家，出融为魏州刺史。

正是由于“帝疾其党”，张九龄由中书舍人改为太常少卿，寻出为冀州刺史，后洪州都督。开元廿四年张九龄罢相，《通鉴》卷二一四亦有如下记载：

于是上积前事，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壬寅，以耀卿为左丞相，九龄为右丞相，并罢政事。

有“阿党”显然是张九龄罢知政事的重要原因，两次贬谪均与阿党有关，足以说明党争对张九龄宦海沉浮有直接影响。

张九龄祖、父官卑，朝无亲朋，加之地居南陬，若入仕升迁，更需在朝显要的推荐奖擢。燕国公张说正是这样一位决定性人物。可以肯定，文献公进士及第后的每一步晋升都与张说有关。开元初张九龄为左补阙，与右拾遗赵冬曦考次吏部试拔萃及应举者，“前后数四，每称平允”。赵冬曦便是张说密友，张九龄也因此三迁至司勋员外郎，与张说的关系益加密切。《旧唐书》本传曰：“时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九龄已欣知己，亦依附焉。”开元十一年，遂拜中书舍人，典掌诏诰，成为宰相张说一臂。开元十四年春，张说受宇文融弹劾，罢相致仕，张九龄也出为洪州都督，俄转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使。张说虽于开元十八年身故，但张九龄重被起用仍与

他有关。《旧唐书》本传说：“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这次召拜便成为张九龄晋身台辅的关键。

二

其实，阿党与否，对评价历史人物无关宏旨。要在张九龄所党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何特质？

如所周知，有三人对张九龄宦海沉浮影响最大，他们是张说、严挺之、周子谅。那么，此三者为人又怎么样呢？

先看张说。可以说他是影响张九龄的核心人物，曾在景云二年入相睿宗，玄宗誉他为“时杰”、“人师”，开元初继姚崇，宋璟之后又三秉朝政。他并非完人，但两《唐书》列举的诸多业绩，今天看来对开元盛世的出现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历来史家都把他列为开元贤相之一。《旧唐书》史臣曰：“郭代公、张燕公解逢掖而登将坛，驱貔虎之师，断獯戎之臂，暨居衡轴，克致隆平，可谓武纬文经、惟申与甫而已。”《新唐书》赞曰：“说于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纳忠倦倦，又图封禅，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谓张说乃开元盛世最值得肯定的政治家，恐不至有溢美之嫌。

再看严挺之。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贡举，时号平允”。出任太原少尹时，玄宗宠臣王毛仲私至太原籍兵马，挺之拒不肯应，并密启玄宗，火恐有变，因而滴迁濮、汴二州刺史。《旧唐书》本传说他“所历皆严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侧息”。张九龄在相位，用他为尚书左丞、知吏部选，陆景融知兵部选，“皆为一时精选”。他尤其鄙薄李林甫为人，居省三年，非公事不与李来往，由此深受李林甫怨恨，两次有可能入相辅政，均遭林甫阻挠。故《旧唐书》史臣曰：“挺之才略器识，不下诸公，耻近权门，为人所恶，不登台辅，养疾官僚。”其人刚正不阿，灼然可见。

周子谅，史书无传，散见记载亦多抵牾。《通鉴》编修时采用《实录》及《旧唐书·牛仙客传》之说，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条记曰：“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谏书为证。上怒，命左右擢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蓝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谅，张九龄所荐也。’甲子，贬九龄荆州长史。”参校其它记载，有两点应

予注意，一是周子谅为九龄一手提拔，曾任长安尉和监察御史，这一点张九龄《荆州谢上表》亦明言不讳；二是周子谅惨遭杀身之祸，是因为他弹劾牛仙客非才，不当为相，至于他是否援引谏语，并无关紧要，牛仙客“非宰相器”，对李林甫只懂得“专给唯诺”，却是史言凿凿的事实。当时张九龄已罢相，“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④而周子谅挺身直谏，“志匡王国，气震奸佞”，⑤不正说明他是浩然正直之士吗？张九龄《荆州谢上表》自言与周子谅无私，其实即便有私，子谅于九龄声誉亦丝毫无损。

所谓张九龄“朋党”，要人已如上述，据此有理由认为，这不是一伙相互勾结，营私舞弊之党，相反，他们都是正直磊落，忧国奉公的志士。

然而事理并非如此简单。《通鉴》列数开元宰相各有所长时，突出称道张九龄“尚直”，从严挺之耻近权门，周子谅冒死匡谏来看，“尚直”确是该党的一个特点。可是此“君子之党”为什么尚直，是什么因素使他们“同道为朋”呢？《通鉴》又言张九龄尚文，我们以为这“尚文”二字才真正道出了张说、张九龄之党的基本特质。当我们把“二张”结朋的圈子稍稍扩大，就会发现圈内之士大多尚文，而且他们与宇文融、牛仙客、李林甫的矛盾斗争亦与“尚文”有关。

以“二张”为核心，荟萃了许多尚文之士，这在两《唐书》中开卷可见。《旧唐书·张说传》说他掌文学之任凡30年，“喜延纳后进，善用已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同书《书述传》则曰：“中书令张说专集贤院事，引述为直学士，迁起居舍人。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光、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其门”。《许景光传》亦曰：“自开元初，景光与中书舍人齐澣、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开元中进士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撰歌诗送行，并汇集成《朝英集》三卷。正是“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首创”的结果。而张说本人亦词理精湛，对所交文人都有独到鉴识。他曾对以文学自负的徐坚说：“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光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懂其所阙，济其

所长，亦一时之秀也”。⑥张九龄受张说影响，入相后也常提携文学之士，“尤鉴于文”的书陟，进士出身的孙逖，九龄任中书令时引以对掌文浩，时人以为美谈，张九龄也因此被誉为“一代辞宗”。著名诗画家王维，初入仕不得志，正是张九龄执政时擢为右拾遗的。⑦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张说、张九龄等“同道之朋”，确有明显尚文气质。

开元间尚文之士不仅彼此文翰酬和，提擢晋升，重要的是他们已形成一股“学士”势力，并且基本完成了宏文、集贤学士向翰林学士的过渡。如所周知，张说开元九年入相，十一年玄宗即下令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贺知章、监察御史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开元十三年，丽正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习称集贤殿。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⑧这些学士，“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但因出入侍从、常参谋议、纳谏诤，越来越受到玄宗亲宠，于是乃与中书舍人分掌制诏。这一变化的关键恰在开元时期。史言玄宗即位不久，置“翰林待诏”，召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洎等入禁中，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至二十六年便正式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分置学士院，“专掌内命”。⑨安史乱后，翰林学士职任益重，“时人谓之内相”，“贞元以后，宰相备位而已”，⑩中书制诏之权大为削减，甚至朝廷诏书被分为内制与外制，翰林学士院成了决策部门的特殊机构。如果说翰林学士出现后确曾出现“学士”与权门之争，那么，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场较量的序幕是从张说和张九龄时代拉开的。二张与李林甫、牛仙客的矛盾冲突是这一事实的最好证明，例如：

《通鉴》二一四：林甫引戴吴为户部侍郎，吴素不学，尝对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伏腊”为“伏猎”。挺之言于九龄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由是出吴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

《新唐书》张九龄传：李林甫无学术，见九龄文雅，为帝知，内忌之。

同上引书李林甫传：始九龄由文学进，

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候，故得大任，每嫉九龄，阴害之。

《大唐新语》卷七：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仙客本河湟一史典耳，投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为不可。”……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邪？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日不知书。……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悦。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九龄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玄宗大悦，遂擢仙客为相。

李林甫、牛仙客等嫉张九龄之党“文雅”、“由文学进”、是“文吏”，而张九龄所党则鄙视李、牛之流“素不学”、“无学术”、“日不知书”。从张九龄朋党多是文人学士的“尚文”气质来看，他们与李林甫之争显然带有学士与权门矛盾冲突的性质，尽管这种冲突在开元年间尚未壁垒分明，但由此足可窥见，安史乱后的学士与权门之争，进士与子弟之争，不是没有渊源的。

三

开元间新兴的“学士”势力，有一潜在因素不可忽视，即“二张”圈内的尚文之士，有相当一部分在南方有生活经历或是南方人。张九龄为曲江人自不必说，张说虽然生活在河南，但一度配流岭南钦州，开元初还曾左迁岳州刺史，荆州长史，他对南方生活是熟悉的。周子谅籍贯不详，张九龄《荆州谢上表》曰：“臣往年按察岭表，便道赴使，访问周子谅久经推覆，遥即奏充判官。”则其起家岭表，或信实不虚。《旧唐书》张九龄传说他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卢怡交结友善。进士严挺之以同学与九龄攀交已如前述，卢怡与九龄系制科“同年”，其友善似不难理解，梁升卿不知何许人，据《唐诗纪事》卷十四，只知他涉学工书，“历广州都督”。袁仁敬诸科出身，据《新唐书》许景先传及《乾道临安志》，知他曾任杭州刺史。进士赵冬曦虽是定州鼓城人，但开元初曾坐事流岳州。开元十三年为集贤殿学士的贺知章，越州永兴人，《旧唐书》贺知章传记载了张九龄等一批南方文人的过从情况，不妨摘录如下：

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

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阳尉，齐融昆山令，若虚兖州兵曹，巨监察御史。融遇张九龄，引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

显而易见，南方人才正在兴起，声誉已渐渐名扬上京，入仕要求也日见明显，有机遇者便仕途腾达，张九龄遇重词学之士的张说，便是这样一种契合，而张九龄引用包融为集贤直学士，不正流露出一种南方人士之间的志趣相投么？

诚然，开元间南方学士势力还微弱，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但是，他们一旦跻身政坛，就有可能跟那些熟悉南方生活的士人结成“同道之朋”。这时，尽管有些士人并非生于南方，然作为志同道合者，他们的政治主张必有相似或相同之处，而其政治主张由于渗透了南方人的思想意识，因而也就必然流露出南方社会生活的俗制以及在这种生活氛围中长期积淀于意识深层的文化特质。我们从张九龄政治生活的具体事例，正可在这方面寻觅出许多蛛丝马迹。

首先，南方人长期生活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与北方人好尚武功有所不同，他们更为注重广德修文，偃武息兵。景云三年张九龄对策“道侔伊吕科”曰：“王道务德，不来不强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劳逸异数，得失分明。故曰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①其抑武之意昭然。开元初玄宗送张说巡朔方赐诗曰：“命将绥边服，雄图出庙堂”，好大喜功之心初始萌动。而当时在朝大臣亦多有应制之诗，张嘉贞云：“山川看似陈，草木想为兵”；卢从愿云：“伫闻歌狄社，凯入系名王”；徐知仁云：“由来词翰首，今见勒燕然。”无不取建功立业，制胜凯旋之义。^②独张九龄不然，诗曰：“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天与三台座，人当万里城。朔南方偃革，河阳复扬旌，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歌钟旋可望，枕席岂难行，四牡何时入，吾君忆履声。”^③大抵寓意于偃武旋师。然张九龄并非不要军备，他在对策中亦明言“有备无患，忘战必危”，其真实目的或许正在于抑制挟势邀功的边防军将。这一点他与张说是不谋而合的。开元以来府兵制渐废，沿边镇兵多达60万，唐初内重外轻之势已不复存在，面对如此局势，张说毅然奏罢20余万戍兵，勒还营农，不久又召募壮士以充宿卫，旬日得13万，所谓“彍骑”是也。^④张说此举显然具

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张九龄对待安禄山的态度，实质上亦反映了他对边军的抑制立场。他执政不久，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有斩可突干功，玄宗欲以为相，张九龄极谏不可。不久玄宗又以凉州都督牛仙客有边功，欲拜台辅或加实封，张九龄又犯颜谏诤，以至罢相左迁。应当指出，张九龄与牛仙客并无私嫌，就在他谏止重用牛仙客的前不久，还为仙客父撰写碑文、荣誉备至。^⑤其出于忧国之心，抑制边将实与张说殊途同归。当时社会正处于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时代，英烈豪迈的边塞诗可以为证。张九龄身处如此时代竟能力主修文广德，这与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对他潜移默化影响，恐必有内在联系。

其次，由于张说和张九龄等“尚文”，他们的政治态度也便具有一明显倾向，即重文才而轻资历，这对隋唐相沿的崇尚阀阅之风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尤应注意的是，隋、唐两代皆上承北朝正朔，政治核心势力主要是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出身寒微的南方人士只能通过科举入仕，这不仅是南士大多尚文的一个原因，而且必然在他们的心理中造成一种“庶出”，以至于象九龄自称为“荒陬贱类”的自惭意识。这种意识的逆反一面，便是对造成“庶出”心理的原因及其对象的敌视。因此，南士一旦有了参政和施政机会，便更能代表庶族阶层的利益，表现出更加坚定的抑制士族的态度。开元中孔至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剝去之。”^⑥张说出身寒微，且与张九龄通谱牒，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由“两人之气类本同也”。故元和初林宝作《元和姓纂》，虽然收入诸多新族，但“二张”仍未被著录。张九龄上奏表章也往往自称“臣山藪陋材”、“草土”、“荒塞”等等，《祭舜庙》一文更抒发了一种已出荒服而不遇的不平之情。^⑦唐玄宗亦流露出对张九龄出身寒微的轻蔑。张九龄的政治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环境中展开的，他不可能不流露出对士族势力的本能反抗。开元初张九龄初任左拾遗内供奉时即上封事，提出要“对弊而不变”的选部之法进行改革，强调重视县令刺史等地方官吏、使京官和地方官常为出入、不得自固，“亦不得十年频在京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凡不历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有善政者，不得入为台郎给舍”。如此内外通流，是针对在京官族“因势附会”的事实提出的，而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则可通过地方官的殿最考核，

择优超补提升,以达到“必取入官之才”等唯才是举的目的。这样,显然对平流进取的士族势力极其有利。张九龄上书亦对自己的矛头指向直言不讳,他说:“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于其私情,遂自得计,何则?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于此。”^⑧勿庸赘言,其阻扼士族贵族因势攀附垄断政治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任人唯才,不循身世资历,显然是他的一贯思想。

最后,自东晋南迁,南方社会比北方安定,战乱创伤亦不及北方严重,因而更多地保留了两汉时期商品经济的活力,加上六朝时期的长足发展,南方商品经济的活跃程度已非北方可比。北朝后期商品经济虽已逐步活跃,但从均田制主要实施在北方的事实足可证明,它所体现的主要是指令性经济。南方经济虽在整体上亦未超越指令性经济的藩篱,但在社会生活中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明显比北方突出。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俗喜商贾”。广州则素为贸易口岸,藩舶辐凑,“种类极多”,^⑨其商业之发达,竟至于南朝朝野早已皆闻“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⑩生长在南方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社会环境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人们的思想感情很容易习以为常地对市场经济采取认可态度,并产生对强制性干预的逆反意识。

开元四年,年届40赋闲家居的张九龄组织开凿大庾岭路,此举的通商意识极其鲜明,所谓“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⑪简练地概括了开拓大庾岭路的必要和经济意义。“二张”同宇文融的矛盾,也是由彼此经济思想歧异造成的。开元中边功渐起,国用日蹙,聚敛之臣乘时辈出,宇文融就是开元九年以搜括客户扩大税收而得宠的。宇文“括户”,说到底不外是指令性经济的一种延伸手段;是国家对经济领域施加干预已告失败的形势下复加强化的一种反映。所以括户的结果必然是“不利居民”、“百姓苦之”。二张与宇文不合,并由此一个罢相,一个左迁,正由鄙视其所为故也。张九龄执政时,开元二十四年正月玄宗诏令天下逃户听其自首,^⑫一改强制搜括之制,恐即张九龄之意。最突出的是,九龄入相不足二月,即“奏请不禁铸钱”,允许私钱流布,引起百官一场争论。盖自武则天后期商品经济日渐兴盛,官府铸钱炉数却不见增

加,流通中的钱币远不能满足商品交换的需求,于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郴、衡地区钱郭尤小,江淮钱币更加滥恶。开元初宰相宋璟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并派专使到江淮督责,结果“市井不通物价腾起”,宋璟由此罢相。开元十七年虽然诏禁私卖铜铅锡及铜器,但私铸者仍禁而不止。开元二十二年初张九龄建议弛私铸之禁,是对现实的承认,注重的是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张九龄的奏议虽未被采纳,却充分显示出南方文化氛围与社会生活蕴育的文人志士,他们思想深层的意识与北方人士有多么不同,而张九龄正可看作是南方文化及其最早与北方文化发生碰撞的代表。

我们不否认,开元年间南北文化之差及其在文化政治领域中的交接碰撞,尚未充分显现。然而有一点未可忽略,即伴同六朝以来南方经济的长足发展,南方人才日见涌现,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南方文化的特质,而张九龄的出现便是这种特质文化同北方文化初始碰撞的标志。此后“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北宋王安石变法等,南北文化相互冲突和融会的趋势益发明,由此所影响的政治斗争也更加激烈。这一课题的深入,非拙文所能蹴就,谨抛此砖,以引良玉耳。

① 《容斋续笔》卷十。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曲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首、卷十六、卷二、卷二十、卷十七。

③ 本文所谓“南方”,系指淮水秦岭以南。

④⑧⑩⑫⑲ 《通鉴》卷二一四、二一七。

⑤ 《柳河东集》卷九《故御史周君碣》。

⑥ 刘肃《大唐新语》卷八。

⑦ 《新唐书》艺文中,王维传。

⑧ 《旧唐书》职官志二,《新唐书》百官志一。

⑩ 《唐语林》卷六。

⑪ 《唐诗纪事》卷十五。

⑬ 《新唐书》卷一九九孔至传。参阅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08页。

⑱ 《唐大和尚东征传》第74页。

⑲ 《南史》卷二三王琨传。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论张九龄诗歌的主体形象与艺术风格

陈新璋

(一)

张九龄的一生处在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顶峰阶段，但他的诗歌对自己所处的繁荣昌盛时代并没有热情的讴歌；他虽然也看到了统治集团中的严重弊病，但现存的二百多首诗，并没有深刻反映社会矛盾的名篇。作为一个文人，他似乎并不理会“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前贤教训，并不把写诗当作什么神圣的事业。他写作不少应制诗，那仅仅是身份职务的需要，他的其它类型的诗，也不是为写诗而写诗的产物，那是他在诗国氛围中一种极其自然的业余习惯的成果。正因此，他的诗大多既不矫情，也不雕琢，真实自然，是自己人生心灵历程的大体写照。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创作的整体窥见他个人形象的概貌，探讨包含在这个人形象中的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并找到其历史价值。

张九龄在自己的诗歌中，是作为一个忠臣形象出现的。这既是他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也完全符合他的生活发展逻辑。他自小接受儒家教育，七岁能文，十三岁而得到广州刺史的赏识，言其必当致远。儒家的伦理大要“忠孝”二字早已牢记在他的心中。他在而立之年开始了仕途生活，一生离家在外，虽然在四次归省与奔母丧中，竭诚尽了孝子之道，但从现存诗歌看，他的尽忠君国的意识与行为显然更为突出。

但我以为，重要的是张九龄在自己的诗中以忠臣形象出现，是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其思想感情的复杂，生活经历的曲折，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创作的诗中主体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在他的大量的诗作中都有深刻的表现。

早年，他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在破除旧的门阀制度，开始使用量才取士的科举制度的鼓舞下，走

读书做官的道路。所谓“避世辞轩冕，逢时解薜萝。盛明今在运，吾道竟如何？”（《商洛山行怀古》）正表现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心态。由于官职数额有限，而趋就者多，因此他在仕途竞进中时而奋励有加，时而忧虑失手，甚至产生了岁月不居，报国无门的哀愁。在二十九岁应吏部试上京途中写的《初发道中寄远》说：“壮图空不息，常恐发如丝。”可说是入仕之前的真实心理写照。

张九龄的中年在官场上度过。照理这应该是实现他早年初衷的较佳处境。但官场的复杂局面远不是他这种性格耿直的文官所能自如应付的。所谓“壮图”其实并没那么容易实现。他尝到了受到羁绊的滋味。于是出处行藏的人生抉择竟成了经常萦绕心中的难题。“他日怀真赏，中年负俗纷”（《初发江陵有怀》）。由于中年入仕有了官场世俗烦扰的负累，他反而留恋起早年未入仕之前的真趣。所以当他开元四年辞官归家时，曾产生了“扁舟从此去，鸥鸟自为群”（同上诗）的将要过上隐居生活的轻松感。但其实这种行动又是与早年的求仕奋进愿望相悖的。因此又不免带着对于官场的留恋与企望。《道逢北使题赠京邑亲知》就含蓄而明白地抒写了这种心情。

征骖稍靡靡，去国方迟迟。路绕南登岸，情遥北上旗。故人怜别日，旅雁逐归时。岁晏无芳草，将何寄所思。

以后，他在短时间的释职家居中，也写了一些诗反映偶得的佳趣，但总是掩藏不住远离朝廷的失落感，以至于“独叹湘江水，朝宗向北流”（《钱王司马入计同用洲字》），借山水以寄情。后来，他再度被召入京，颇为高兴。用诗真实地表达了赴官报主的深层意愿：“恋亲为委咽，思德更踟躇。徇义当由此，怀安乃颯如。愿酬明主惠，行矣岂徒然。”（《初发道中赠王司马兼寄诸公》）可见在出处行藏的抉择中，他最终还是服从于做一个符

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忠臣”的理想。

张九龄的晚年曾经位居宰相，真可以大干一番“致君尧舜、齐衡管乐”的事业了。但是事与愿违。他所依恃的唐玄宗这时已经从一个精明强干的盛世君主开始变成一个好大喜功、淫乐无度的昏君。他远贤近佞，使得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得以窃据当朝要职，对张九龄等贤臣进行打击排挤。张九龄以前就常常有忧谗畏讥的感情形诸于诗，至此当然更觉得“不谄词多忤，无容礼益卑”（《南还以诗代书赠京都旧僚》）。但他还是秉忠直言，对于唐玄宗受李林甫之蒙蔽而欲任为宰相提出劝谏，说“宰相系国安危，林甫非社稷之臣也。陛下若相林甫，恐异日为社稷忧矣”（《奏劾林甫》）在对皇太子的废立、对张守珪、牛仙客等人的封赏任用问题上又犯颜直谏，以至触怒了唐玄宗。张九龄在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唐玄宗的信任之后，深感在朝的前景暗淡，于是向炙手可热的政敌妥协，以退出朝廷换取晚景苟安。《全唐诗话》卷一记载：唐玄宗听信谗言，决心疏远张九龄，派高力士给张九龄送去白羽扇，寓秋来罢用之意。张九龄于是作《白羽扇赋》，说“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篋中。”又作《咏燕》诗赠李林甫，向他表白自己无心竞争：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
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不久，张九龄罢相徙荆州长史。其诗作中虽然不乏为自己辩解、伸屈，但对时主并无半点埋怨。只是说小人竞进蒙蔽了圣主：“凡鸟已相噪，凤凰安得知”（《杂诗五首》）俨然一付忠臣口吻。

从早年到中年到晚年的诗歌创作历程所描绘的诗人主体形象中，可以看到：未入仕时奋发求仕，既入仕后常思归隐；官场是非多，正直之士动辄得咎，以至于忧谗畏讥，而一旦离去，又怀恋不已。这种心态轨迹，不仅张九龄具有，古代许多诗人也具有。从这个意义讲，张九龄诗中的主体形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富于典型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到，作为盛世帝王的辅弼，从敢于与奸臣明斗，犯颜直谏，到主动向政敌妥协，明哲保身，依然一付忠臣面目。这却是张九龄诗中主体形象富于个性的一面。毫无疑问，张九龄无意在诗中作自我描画，但他的有感而发的诗篇，客观上恰恰最真实地画出自己的上述形象。

张九龄诗中的主体形象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

灵魂的。积极入世，读书做官，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忠君为人生大节，忠孝兼而得之——这是诗中主体形象的思想支柱。这其实是封建社会一般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的体现。这种群体意识也是封建统治者所赞许的。唐玄宗在张九龄罢相以后所提到的“九龄风度”的主要核心内容就是如此。

长期以来，人们从社会学的角度，以政教第一的标尺去评判文学遗产，认为诗歌的社会功能主要应是直接干预现实，反映重大社会事件。以此观之，张九龄的诗歌显然还缺乏深刻的社会价值。但如果认为诗歌也可以以表现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心态轨迹为主，让读者从中看到诗人的自我，并推而广之，窥见诗人那个时代的同类人的心灵轮廓，那么，张九龄的诗歌还是值得一读的。无庸讳言，这些诗歌在表现诗人独特的个性特点方面还不够生动活泼，诗中的个体意识往往为群体意识所掩盖，因而主体形象还缺乏动人的情趣，给人的印象并不太深刻。

（二）

在文学创作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作家在艺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艺术风格是指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点。张九龄诗歌的这种综合性的总体特点，明人曾概评之曰“清淡”。胡应麟说：“曲江清而淡”（《诗薮》外编卷四）。胡震亨说：“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唐音癸签》卷九）。可惜语焉不详。笔者认为：“清淡”确实是张九龄诗的基本风格。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张九龄诗歌中所描绘的诗人主体形象给人以谦和的印象。早年，他虽然有“致君尧舜，齐衡管乐”的抱负，但在诗中，他并未过份宣扬，不象有的诗人那样在诗中一再表白自己的宏愿。他早年即已聪颖过人，张说誉之为“后出词人之冠”（见《新唐书》本传），但诗中并无扬己露才之处。中年经历世道炎凉，但毕竟不算大起大落，谈不上生命攸关的迫害，所以虽然也有不少忧谗畏讥的诗句出现，但基调还不算是到了愤世嫉俗的程度。辞官或迁徙，心中固然不痛快，但也常有得田园之趣的吟咏。晚年进入一生事业的顶峰，位极人臣，而诗中并不见得踌躇满志，词锋逼人。《咏雁》一诗借以自比雁的形象，志趣高远而嗜好淡薄，诗人以此作为退出政坛中心的自白，毫无

摧颓伤感的表现，正说明位居宰相纯属自然而然，并无多大的权势欲望，更非上下其手，见不得人，因此，出于不得已而离去宰相之位，也不至于过份惋惜，更不至于悲如之何，在为数不多的有感而写的咏物诗中，诗人自比荷叶（《钱济阴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叶》）、庭梅（《庭梅咏》）、秋兰（《园中时蔬尽皆锄理，唯秋兰数本委而不顾，彼虽一物，有足悲者，遂赋二章》）、孤鸿（《感遇》四）等。虽暗示自己品性芳洁、不同流俗，但这与另外一些诗风或奔放或沉郁的诗人常常以鲲鹏、以骏马自喻，在格调上迥然不同。从那隐然出现的人淡如菊的形象与那谦谦君子的风度中，可以感觉到作品风格上的清雅、平易与蕴藉，也就是清而淡的内涵。

二、张九龄诗歌中所描绘的山水田园风景给人一种清新恬淡的美感。诗人从赴试到任官，几十年间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一生写的纪行诗达四五十首，占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强。这些纪行诗有的侧重写山水风光，有的简直就是山水诗。举凡岭南风物、湖湘旅情、庐山瀑布、长安春景等等，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其间，也有少数篇什以健笔画出壮景，表现了诗人创作风格在稳定中有变异，但更多的作品是清新淡远，引人入胜。诗人为官期间，几度归家省亲。也曾辞官家居，晚年罢相之后，笃好田园真趣。因此，在他的诗集中，也出现了一些家园风味颇浓的诗，即古代诗人习惯上所称的田园诗。可以说，张九龄的山水田园诗确有独特的风貌，从而在盛唐诗坛上占有别人不能代替的一席之地。胡应麟以“清而淡”概说张九龄的诗，应该说主要是根据此类作品而言。他甚至对相类似的几个诗人的诗歌风格做了概括性的比较：“曲江清而淡，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胡震亨干脆把这些人说成“清淡之派”，其首创者乃张九龄，余皆继起而“益以风神者”。其实，孟浩然、常建、王维、储光羲等“清淡之派”正是后人所说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说张九龄的山水田园诗给人以清新淡远的美感，是因为这类诗不仅能写出眼前景，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其中又有颇为动人的情，令人遐思。在形式上绝少浓墨重采，破空而来，往往是白描手法，平常色调。总的说，写景较为客观朴实，绝少夸饰和幻想，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绝少借助议论的方式，也并不过分强化，因而显得平和委

婉。试看《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间。虽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闲。暝色生前浦，清晖发近山。中流淡容与。唯爱飞鸟还。

落日行舟，中流容与，远浦暝色，近山清晖，眼前飞鸟自在飞翔……于是触发了诗人忙里偷闲，尽情领略大自然美色的兴趣。真是眼前美景可道得，其间真趣亦宛然。

再看《林亭咏》：

穿筑非求丽，幽闲欲寄情。偶怀因壤石，真意在蓬瀛。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气清。从兹果萧散，无事亦无营。

闲居在家，山石池竹等田园风物固然可以怡情，而真正的美意却在避开了人世的竞争钻营。“偶怀”与“从兹”二联以明朗的语言表达了淡薄的志趣。

三、张九龄的诗歌所表达的意象、思想多含蓄而不直露，初看似乎感情色彩并不浓烈，细细品味，才觉得意识清新、感情明朗。这在那些表现仕途奋进与身世之感的作品中尤为突出。例如《春江夜景》：

江林皆秀发，云日复相鲜。征路那逢此，春心益渺然。兴来只自得，佳处莫能传。薄暮津亭下，餘花满客船。

这是一首山水诗，写于开元六年应诏赴京途中，也可做纪行诗看。诗中山水真景在首尾二联。而中间二联则全是抒感。诗人当时是辞官之后应诏复出，而辞官是出于不得已，应诏复出才是由衷之愿。比起李白应诏上路时写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爽坦直来，“兴来只自得，佳处莫能传”二句要含蓄蕴藉得多，它似在写景，实又言情。

用赋笔来达到含蓄而不直露的艺术效果其实是不容易的。张九龄诗中更多的是采用比兴的手法。除了诗中各别事物的比兴之外，全诗运用比兴，成了比兴体诗的篇什也不少。且看《感遇》之一：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沈德潜云：“‘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想见君子立品。即昌黎‘不采而佩，于兰何伤’意”。（《唐诗别裁集》卷一）诗格不亢不卑，而比兴寄托之意，读者要经过思索，方可理解。所以有人说：

“读张曲江诗，要在字句外追其神味”（《白华山人诗说》引）。这类诗长期以来，有较充分的探讨，此处不赘。

张九龄的诗之所以含蓄而不直露，除了艺术上的自觉追求（主要是表现手法的选用）之外，看来，还有思想意识、性格特点上的原因。他本人正如他的《咏燕》诗所塑造的海燕一样，适性、谦和、知度。这正是儒家所要求的温柔敦厚的处世态度。这反映到创作上就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因而在别人可能用激愤甚至偏激的语言来表达的，在他笔下，却出现了含而不露，适可而止，有意淡化，却又明晰的艺术效果。

张九龄诗歌清淡风格的主要表现已如上说。这种风格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从对他现存诗歌作品作大体编年，我们会发现，他的“清淡”的诗风在早年创作中已经出现，而且一出现便显得颇为成熟。直到晚年，他这种诗风大体未变。这在他大量的纪行诗（含山水诗）和比体诗中表现更为明显。上引的《自湘水南行》和《春江晚景》都作于四十一岁以前。而人们熟知的他晚年《感遇》十二首中的咏丹橘，以及上引的《咏燕》诗，虽然在具体内容上不相同，但在出处行藏的处世态度上，格调是一致的，所采用的借物咏志的手法及其平和气势也可以说并无区别。由此可以认为：张九龄诗歌的“清淡”风格形成较早，并大体贯穿始终。

最后，还必须指出，风格的多样化，是成熟作家在创作上的常态表现。张九龄作为盛唐初期的成熟作家，他的诗歌除了“清淡”风格的作品之外，也还有古朴简劲和典雅浮泛等其它风格的作品。张九龄的恩师张说是当时的“大手笔”。他与徐坚论及当时文坛状况时，曾言及张九龄的诗

说：“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新唐书·文艺传上》）。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则驳正之，说这是局限于当时的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为定论。”按张说比张九龄早谢世十载。他与徐坚说这番话时至少尚未见到张九龄晚年的诗作。因此，以他这番话来概评张九龄的诗歌创作当然不妥当。若参之《四库全书总目》的驳正，确认张说受初唐绮靡诗风的局限，“以富艳求之”，那张说的评论就更不容苟同。但假如从张九龄早年及中年的一些诗作看，则确实也有比较古朴简劲而略输文采（也即“窘边幅”）的篇什。这尤其是那些酬答诗和部分杂感诗。在这些诗中往往频用典故，虽然“骨峻神疏，思深力道”（施补华《峴佣诗说》），却难免韵味不足。即使受者（酬答对象）易知，毕竟读者难懂。好在此类作品数量并不太多，因而始终不掩清淡一格。此外，在现存《曲江集》中，数量可观的应制诗和在官场中的奉和诗，除了个别篇什包含真情，可见忠臣面目之外，大都是内容浮泛，形式典雅，“有垂绅正笏气象”（《四库全书总目》评语），在文采、诗味方面远不能与那些“清淡”之作并列。由此可知，张九龄诗歌虽具有多样风格，而作为自立于盛唐诗坛的独特风格仍是清淡一格。

① 据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文史》第八辑，1980年版）。

作者附记：本文有关张九龄诗歌的编年，参考了刘斯翰先生校注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岭南文派”属于“太平洋文明”圈的开放型文化，出路不在于回归传统，而在于超越地域与传统。

· 关于岭南文学的讨论 ·

在新的历史座标上选择：回归或超越

——也谈“岭南文派”

文 能

“岭南文派”的提出和讨论，已近三年了。但三年来的文学实践，却呈一种事与愿违的趋势：在创作上，那种“应该”出现的“岭南特色”并没有因之浓郁起来，相反，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及都市文明的兴起，广东文坛的“地域风情”日趋淡薄；在理论上，“岭南文派”的界定与讨论横竖是一些“地域风情”、“方言特色”之类的东西，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究竟“岭南文派”在理论上的失误在哪里呢？

我认为，广东文学所面临的困境和所受当时文学“寻根热”的影响，使“岭南文派”主张的提出带有较浓的情绪化和理想化的色彩。“岭南文派”的倡导者们一开始就没能把支撑、制约这一文学的特定文化放在一个适当的历史座标上加以认识，他们囿于传统的思维习惯，把一种处于动态中的文化状态放在一个相对凝固不变的历史

史框架中加以考查，从而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虽然早在80年代初期，广东青年评论家郭小东、陈剑晖就曾撰文论及岭南散文特点及流派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和反响，因为当时整个文坛的“热点”仍集中在对“文革”、“反右”等历史问题的反思上。1985年前后，新时期文学进入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文学已不满足于在政治层面上反思历史，表现生活，她寻求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拥抱生活，思考人生，并建立自己独立的审美品格。随着文学“寻根”的呼声四起，并获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使从“伤痕文学”以来在全国文坛一直占有一定地位的广东文坛不无惊恐地发现，自己被时代文学的潮头所抛弃了。于是，在一种焦灼忧虑笼罩下的广东文学界，打起了“岭南文派”的旗帜，希望通过表现

浓郁的地方特色而形成独特的风格，重振粤军的军威。所谓“岭南文派”及其支撑这一文派的“岭南文化”的提法，无疑是以“西部文化”、“黄河文化”等作为参照系而与之并称的一种地域文化。“岭南文化”，在区域空间坐标上，指的是五岭以南的地理区域；在时间坐标上，论者们却取向各异，但总的来说具有一种回溯性。那么，在这一空间坐标系上建立的“岭南文化”是否能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间坐标中保持它的独特风貌从而建立起富有地方风情的“岭南文派”呢？

首先，一种地域文化往往是落后闭塞的环境与不发达的生产力造成的。逶迤险峻的五岭山脉，在漫长的历史中，阻隔了岭南与中原的文化交往，拉开了岭南与文化中心区的精神距离，一种带有地域性的文化：人的生存方式、风俗人情、语言和思维的习惯便因此产生。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今五岭山脉已不再成为社会文化交流的障碍，且岭南地区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不但为这一地区的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使这里最先感受到了汹涌而来的太平洋文明的浪潮，使之成了中外文化的交融点。更为重要的是都市文化的兴起，人际关系的快速流动所带动的相互融解，形成一种与物质文明状态相适应的新的文化状态，这不是用“岭南”这一区域概念概括得了的。

其次，在时间坐标上，“岭南文化”的取向有较大的模糊性。如果说历史上曾有过一种“岭南文化”的话，那么这一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史前期。考古资料证明，岭南一带确实存在过不同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一种独立文化，

可惜因为潮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很少保存下来，其发展水平和影响很难考证和确定。（二）同化期。自春秋晚期到秦，岭南一带因为远离战祸纷繁的中原地区而成为中原（包括江南一带）地区各民族躲避战祸的理想迁居地，从此，岭南一带落后的越族文化开始受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并逐渐被同化。秦王朝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加速和强化了这一同化过程，在此后的二千多年里，岭南的文化基本上与中原文化保持着同构的稳固关系，但没有质的区别。作为这种文化的反映和延伸的文学，我们从唐代张九龄到清初的“岭南三大家”的诗词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种被中原文化同化的表现。（三）变异期。近代以来，随着岭南沿海商业贸易的发达，特别是西方文化侵入，资本主义开始在这里萌芽，岭南文化注入了一种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新质，从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吴趼人和黄小配等一代具有全国影响并领导着当时全国文学新潮流的文人及其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新质文化的特色。由此看来，所谓“岭南文化”在时间坐标上无疑太过笼统而无法界定，惟有近代以来形成的具有新质的文化，才能代表岭南文化的特质。然而问题在于，“岭南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其时间取向的回溯性恰恰与近代以来岭南文化的质变背道而驰——因为生产力越发达，地域性的文化色彩就越淡薄——而且造成了“岭南文化”无法涵盖今日正在发展中的文化的困境。

文化作为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它的发展需要和走向，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前提。由于历史的发展，

为了揭示这种关系，我们不能不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对广东文化的发展和文学的流向进行观照。这一新的历史坐标在空间和时间坐标上都是开放的系统，在空间坐标上，是指由某一内核文化（主要指珠江三角洲一带生产力较发达地区已初步形成的海洋型商品文化）向外辐射、扩展所形成的社区文化；在时间坐标上，它的指向是从近代以降几十年或一百年的时间，世界经济中心由北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太平洋文明时期”，这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步调是一致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坐标上，广东文学界将做何选择呢？是回归，还是超越？

回归是一条似乎风险较小也比较容易取得成功之路，一方面前人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读者的欣赏习惯和惰性为阅读这类作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岭南文派”的主张就明显带有这种回归倾向。其倡导者大都喜欢从过去的创作中寻找依据和出路，把从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吴趼人，到现当代的欧阳山、黄谷柳、陈残云和秦牧等人的创作视为典范，以“把握岭南文学的地域型和风格型的特点，使岭南文学的面孔逐渐清晰起来”。（黄伟宗）问题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的地域文化的体现和延伸的文学，能有多大的生命力呢？光凭这种地域型、风格型的优势，广东文学就能摆脱困境，走出五岭山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吗？如果说西部文化、中原文化以其悠久厚重的文化积淀仍能在凝重、浑厚的“黄土高坡”上，在火红的“高

梁地”里，开放出一批璀璨夺目的文学之花的话，那么在岭南这块文化传统相对稀薄的土地上，却是很难再培育出地域文学的优良品种来了。在广东近年崛起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刘西鸿、张欣、李兰妮、罗建琳、石涛、谭甫成，贝岭，欧伟雄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很难找到“岭南”的印记，而总是和都市文明、商品文化联系在一起；岭南农村清香四溢的乡土气息已渐渐被五光十色的都市霓虹灯所取代，五十年代名噪一时的乡村“俏妹子”也早让位给高第街的个体户们；悠然宁静的田园牧歌再也唤不起作家们对昔日农耕文化的向往，相反，他们纷纷踏着时代生活的节拍扭着迪斯科走进文坛……

显然，回归更多的是一些理论家们的一厢情愿，这既无助于广东文学在全国文坛上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特色，也无法使广东文学的发展与当今文化的流向相一致。只有超越原有的地域文化带来的局限，超越旧日的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审美规范与格局，我们的文学才能与现代文明的流向相一致而显示其生机与活力。然而，超越又是艰难的，无现成的经验可借鉴，而新的文化又因处于萌生期而无法清晰地显示自己的面貌，更何况传统的负担又是如此沉重。但是，可以相信，一旦条件成熟，广东文坛便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单位：广东花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陶原珂

读李翀《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

金 华 庆

中山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李翀博士所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刚出版，我便有幸拜读，该书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三篇共三十章，全面系统地阐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我国出版的同类教科书已不下十种，但这本书以它新颖、准确、严谨、完整、中肯的风格，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据专家评价，李翀的这本书与国内同类教科书相比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项可喜成果。

李翀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具有下述特点：

1. 内容新颖。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本身在不断地发展。李著把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概括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我们从现代货币原理、国民收入和货币均衡的分析、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均衡的分析等章节，读到了不少新的内容。

2. 联系实际。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着较强的实用倾向，它的理论分析大都为实际决策服务的。李著反映了这个特点。它在阐述每个原理以后，都分析了实际的应用情况。例如，厂商如何利用弹性原理制定价格，如何利用成本原理安排生产，政府怎样利用国民收入原理和货币原理制定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都给予思考和启发。这是这本书有别于国内同类教科书的特色。

3. 逻辑严谨。如何安排逻辑结构，是撰写教科书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李著在这方面也是很成功的。它结构严密，循序渐进。以宏观经济学为例，李著首先分析了国民收入原理，阐述了以该原理为基础的宏观财政政策，接着分析了现代货币原理，阐述了以该原理为基础的宏观货

币政策；然后把国民收入原理和现代货币原理结合起来，分析国民收入和货币的均衡，以及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均衡。脉络清楚，层次分明。应该说，李著程度不浅，但由于逻辑严谨，加上文笔流畅，表达准确，仍易于为读者所接受。

4. 体系完整。在我国目前出版的同类教科书中，李著的体系是比较完整的。它不但增补了国际经济学部分，而且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论述也很全面。例如，书中对分配原理、工资原理、利息原理、国民收入和货币的均衡、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均衡等分析都比较完整。

5. 阐述准确。李翀积多年教学经验，了解学生学习中的种种问题；因而对某些难点作了详细的解释。例如最大利润和最小成本的关系、最大效用原则和需求曲线的关系、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的关系，IS—LM曲线的推导等，在李著中都被解释得清清楚楚。

6. 评价中肯。如何分析和评价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读完李著之后，感觉到这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它对各种西方学说、流派、观点，力忌笼统评价，而是具体地进行分析。如果是错误观点，哪方面错了，为什么错，如果可供我国参考，哪方面是可取的，哪方面是不可取的，可取的部分应该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加以运用。读后很受启发。

这本书出版以来颇受高等院校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略感不足的是国际经济学部分还比较单薄。李翀同志仅34岁，正是大好年华，我们期待着写出更多高质量的教科书和研究专著。

作者单位：《国际金融导刊》编辑部
责任编辑：英 隆

稳中求变 变中发展

——佛山市变压器厂的经营之道

吴荣茂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搞活产品单一的具有诸多稳定因素的国营企业，使其产值增长牢固地建立在经济效益增长的基础上？仅有401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佛山市变压器厂（以下简称“佛变”厂）的领导在实践中坚持探索，使1988年的年产值比1987年增长32.2%，劳动生产率增长26.8%，利润增长66.8%。事实证明，“佛变”厂的探索是成功的。归纳起来，其经营之道是：

一、既善于紧紧地抓住生产环节中的“牛鼻子”，又善于做到“供、产、销”的辩证统一。

“佛变”厂领导者善于把握生产中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依据这样的变化来解决问题。比如，在变压器生产的行业中，以往，其原材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都有比较稳定的渠道和较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供、产、销”诸生产环节中，关键问题是生产，谁能保质保量的生产出产品来，谁就掌握了主动权。然而，1986年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变压器市场销路较好，加之一些地方采取的保护政策，转产变压器的厂家日益增多，原材料供应市场随之日趋紧张。对这一信息进行及时地分析之后，“佛变”厂的领导者们得出这样的判断：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找米下锅”（原材料的供应）已经转变为生产中的“牛鼻子”，当务之急，就是要组织好原材料的供应，才能牵住生产的“牛鼻子”。据此，他们采取了如下几个有力的措施：

第一，在资金上优先保证原材料的组织。以1988年为例，根据生产的要求，该厂需组织800多吨矽钢片，所需资金400多万元（占全厂流动资金的一半，同时，如果一次性购进上述原材料，还得付出4个月利息）。他们决定付出这笔资金组织原材料。这样，在一些单位正愁“无米

下锅”之时，他们却拥有全年原材料用量2/3的储备，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第二，提早准备原材料的组织，做到有备无患。

第三，做好公关工作，广开原材料组织渠道，把与客户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祸福与共的良好关系视作企业稳定而持久发展的根本。

供、产、销的对立统一，不仅仅体现在三者主要矛盾的变化之上，而且还体现在相互的影响之中。在供产关系上，由于原材料供应充裕，这就使生产潜力的挖掘成为可能。如在1988年第四季度中，根据原材料进场较多的情况，该企业组织“大战九十天”的劳动竞赛，从而在这最后的3个月里，实现销售收入1100万元，产量21.432万KVA的成绩，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充裕的材料储备。在对待产销关系问题上，尽管一直未呈现出“卖方市场”，但该厂的领导者认为，由于一方面生产的多少取决于销售可能，另一方面生产效益最终要通过“销”来实现。据此，该厂一直坚持了两保（保指令计划指标、保老用户）和售后服务的原则，博得了用户的赞赏，销路更旺。

二、居安思危，做到近、中、远目标的兼顾和统一。

在经营管理上，如果不把眼前利益与长远的发展结合起来，只顾近期的目标而不顾后劲的培育。那么，前者只会成为后者的障碍甚至是祸害。“佛变”厂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始终处理好“安”与“危”、“眼前”与“今后”的辩证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的做法是：

第一，在产品销售畅通的情况下，并没有陶醉于“皇帝女不愁嫁”的盲目乐观中，而是注意在“居安”之时激发职工的危机感，使大家认识到产

品单一将是今后赢得市场的一大障碍。因此，该厂的领导明确地提出了在产品种类的问题上，必须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好，人好我廉”。一是做好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生产第一代，试制第二代，设计第三代，设想第四代”。二是确定了“多规格、少批量”的生产原则，提高了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

第二，锐意提高产品的质量。厂长齐建中同志认为，“变”与“不变”也是对立的统一。产品的品种规格可以也应该是不断地变化，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能最终赢得市场。该厂把质量问题提到很高的位置上。1988年该厂对全厂的产品进行全面的检查，产品抽查合格率达到100%，成品一等品率达到了71.53%。

第三，在1988年，该厂了解到外汇行市将变化的信息后，果断地收购了市场上200多吨薄板材料及几百吨砂钢片。10天之后，原材料价格猛涨，原卖主愿以当时的市场价格回购，反手之间“佛变”厂可得利润300多万元，这等于全厂职工干一年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但他们坚定不移地将原材料用于生产的正常组织，充分体现了时刻将工厂的长远利益、将培育企业后劲摆在首位的自觉性。

三、合理地把握好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度”，使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

走集约经营发展之路并不排斥外延扩大再生产。据此，“佛变”厂根据自己的情况，引进了西德波纹油箱生产线和砂钢片生产线，扩大和改造了生产场地，使厂房面积从原来5984.6M²增加到12870.31M²；增添了一些新的生产专用设备，使固定资产净值从原来的230万元增加到1300多万元，大大地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为产值、利润的增长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走集约经营发展之路更意味着将更多的人、财、物投放于内涵扩大再生产之上，为此，他们采取了如下的几个主要措施，多渠道地增进企业职工素质。近两年来，除了调入大中专毕业生和科技人员10多名外，还拨出教育经费28898元，选送部分人员到大学或研究所培训，组织了489人次参加各种教育和培训；推广满负荷工作法，使生产的组织更加有序、紧凑和科学化；在车间设置了“六大员”（生产调度员、设备管理员、工艺员、统计员、经济核算员、产品质量检

查员）制度，加强了车间及班组这个重要生产单位的管理，使自我制约机制更加完善；改进工艺技术，优化产品设计。

这一切表明，该厂企业发展战略已经从传统的以粗放为主转变到以集约为主上来，智力出效益，技术出效益，管理出效益，这是“佛变”厂始终坚信不移的经营原则。

四、“以欲从人”，把人与物辩证地统一起来。

人的行为动机、动力是和物质利益密切联系的，因此，要使职工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就必须“以欲从人”，既视物（重视物质生产）更视人（关心人们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这是“佛变”厂经营之道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时刻关心职工福利，注意改善职工待遇，这是该厂“视人”的基本方面。在具体做法上，力求把他们积累资金与消费资金的比例定得比较合理，特别是在消费资金的使用方面，注重放在解决职工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之上。到目前为止，基本解决大部分职工的住房问题。与此同时，该厂还将在3年内全部解决职工的煤气炉问题（目前已解决了2/3），此外，工厂还提高了职工在食堂的伙食补贴。由于职工亲身感到工厂的领导对这些问题竭尽了全力，尽管还难如人意，也能予以谅解。

目前一些企业承包后的一个短期行为是，只顾企业的产值和赢利而不顾职工的劳动保护和身体素质的提高，“佛变”厂却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企业的素质是由职工的综合素质决定的，而职工的身体素质是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主动举办各项体育竞赛，还拟拨出资金建立工厂的健身室、桌球室、舞厅、乒乓球室、篮球场等文化娱乐基地，为职工日常的文体活动提供条件。

该厂还开展为职工庆祝生日，厂长与职工对话等活动，沟通相互的感情，使职工在精神情感上受到尊重和满足。

该企业既视物更视人的经营之道还更突出地表现在悉心培育企业精神之上。他们通过“佛变”精神的征集活动，通过“六个一”活动（每个职工为企业做一件好事，为企业节约每一厘钱，为振兴企业提一个合理化建议，为企业的发展钻一门基本功，为企业的信誉不出一件废品，为提高生产效率搞一次小改革），强化了“严谨、求实、创新、效益”的企业精神，从而增进了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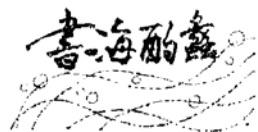
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综上所述，“佛变”厂经营之道的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一切着眼于人：在生产的材料组织上，才会注意人际关系的建立；在利润和名誉面前，更注重于人的名誉；在生产的要素中生产资料与人的问题上，更注重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在调动积极性手段上，要注重对人感情的投资、人的精神享受的需要……这就使企业的竞争实力处

于稳定的状态，使人的全面发展与企业的发展同步进行，这是“佛变”厂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

作者单位：佛山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范英



关于“守清”与“代清”

陈华新

康有为的《康子内外篇·人我篇》云：“守寡不已，则有守清，守清不已，则有代清者，余乡比比皆然。”台湾蒋贵麟主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以及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均未加注释。笔者曾向有关专家请教，均不甚了了。近得南海县志办公室黄志扬复函，中云：关于“守清”、“代清”问题，据一位调查过我县“自梳女”的历史情况的退休老教师的解释，为求死后有个牌位受人祭祀而嫁给已死去的人，名义上是已嫁给了某家，成了某家的人，实际是守活寡者谓之“守清”；为求死后有个牌位受人祭祀，而与男方商定，由自己出钱请别的妇女嫁给他，而自己也在名义上算是嫁了给这家，属这家的人，而实际上与男方并无任何夫妻生活，实际上也是在守活寡者，谓之“代清”。

另据南海县一位妇联干部（西樵人），则认为“守清”是指订婚后未正式结婚，丈夫便死去，未婚妻仍要过门，披麻带孝守寡。这就是说，“守清”一定要过门到夫家守活寡。至于“代清”，是指经济能够独立的未婚女子，她们不愿结婚，而又认了一个男人为“丈夫”，出钱替男人娶个妾侍，自己名义上是“大婆”（正妻），从不与丈夫同房，生前不到夫家，死后才把神主牌安放到夫家，称为“代清”，即请人代她出嫁，自己守清寡。

“自梳女”、“守清”、“代清”女多出现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因这一带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女人可以自谋生计，充当缫丝女工或纺织女工，经济上可以独立。她们不愿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旧社会婚姻不自由，婚后受夫权压迫和家姑的虐待，于是宁可过独身生活。这可视为对封建婚姻的消极反抗。但是，她们又受传统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认为生前不结婚，死后变成孤独的“女鬼”，为求死后有个牌位供人祭祀，而甘当“守清”、“代清”女。康有为说他的家乡“比比皆然”，说明在清末的南海县，“守清”、“代清”女是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这种奇特的婚姻，只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能出现。半封建相对于半资本主义而言，由于出现了半资本主义经济，妇女可以自谋生计，经济独立，才能去当“守清”女，甚至出钱雇人代嫁而自己充当“代清”女。

发挥广东社会科学界智力优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不断开拓办学新路子



△省高教工委书记杜联坚、省高教局局长李彦宏和副局长李冠创来校指导工作。



△校委会主席张江明、校长刘畴在毕业典礼上讲话。



△广东社科大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图为外语系学生正在视听室上课。



《学术研究》是广东省社
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具
有余年刊龄，在国内外有较大影

◀ 图为该刊编委及部分作者、
读者一起总结办刊经验。

▶ 图为该刊工作人员向
省社联党组领导汇报工作。



省社科联属下广东智力开发中
心创办的广东智力开发业余学校，
是国内首间培训专业美容师的学校。
开办四年，学员逾五千，毕业生遍
布全国各地和港澳地区。

▲ 该校师生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



▶ 学生正在上课。